

唐代後期支竦家族研究*

翁育瑄**

摘 要

以瑯琊（琅邪）為郡望，世居江南的月氏人後裔支氏家族，建中年間朱泚之亂，支成以勤王之功獲得朝廷贈官刺史，以後其子支竦以鴻臚卿致仕，家族至此時已步入高官之林。支竦遺言指示子孫遷葬祖塋於洛陽邙山，本身及其子又與舊士族聯姻的作法，展現該家族意欲打入首都上層社會的強烈動機。

到了支竦的下一代，支訥兄弟一方面藉其父之餘胤，一方面又以科考為入仕之階，支訥、支謨、支詳兄弟三人位階二品至四品，仕途可謂順遂。尤其是支謨與支詳，支謨位至大同軍防禦使，支詳位至武寧（感化）軍節度使。在方鎮地位日趨重要的唐代後期，支氏家族能出現兩名方鎮，意味著該家族在朝廷中已占據了高位，家族發展進入全盛時期。

支氏家族雖然在唐末進入了家族的全盛時期，卻遇上河南逐帥風潮，支詳全家慘遭殺害，就此結束了家族的發展與承傳。家族命運與唐代後期的歷史，脈動相連。支氏家族的遭遇，可謂是時代潮流下眾多悲劇之一幕。

男姓家族成員的仕宦經歷之外，女性家族成員亦有引人注目的生活經驗。年幼出家，終身居家未婚的支志堅，適逢會昌法難，改宗道教。她與崔氏（邕州長史妻）在咸通二年（861）的逃難經驗，也告訴我們這些

2021 年 10 月 14 日收稿，2022 年 4 月 9 日修訂完成，2022 年 10 月 27 日通過刊登。

* 本文為科技部專題計畫「唐代藩鎮體制下的家族與社會」（計畫編號 MOST110-2410-H029-003）研究成果。

** 作者係東海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

家屬們陪伴丈夫、兄弟赴任地方，生活並非絕對的安穩，如遭遇地方動亂，對當事人必然造成極大的衝擊。

透過支氏家族的男性墓誌，一方面了解該家族進入洛陽上層社會的過程，一方面也藉由仕宦經歷，探究該家族晉升高官的管道。而該家族的女性墓誌所記載的地方社會動亂，讓後人得以窺探官員家屬的生活經驗，進而對於唐代後期的士族生活，有了更深一層的認識。

關鍵詞：唐代後期、支竦家族、墓誌、士族、方鎮

一、前言

家族成員活躍於唐代後期，跨越五個世代的支竦家族墓誌群，見證藩鎮時代歷史的發展。支竦家族墓誌群於 1920 至 30 年代即已出土問世，岑仲勉四校《元和姓纂》時，即運用該家族的墓誌佐證支姓一條。¹但接著卻要等到 1980 年代後期，才又再度見到有人關注這個家族的墓誌。馬小鶴、柏曉斌〈隋唐時代洛陽華化月支胡初探〉探討月支胡後裔問題，其中包含對於支竦家族墓誌的探討。²之後又有榮新江〈小月氏考〉探討小月氏與其後裔的活動，以支竦家族墓誌作為月氏後裔進入洛陽之代表。³拙文〈七世紀～十世紀初の中国における上流社会の家族形態——墓誌を中心に〉亦曾利用包括支竦家族在內的眾多家族墓誌，探討唐代上層社會的家族形態。⁴

1 唐·林寶，岑仲勉校注，《元和姓纂（附四校記）》（北京：中華書局，1994），卷 2〈五支〉，頁 79。

2 馬小鶴、柏曉斌，〈隋唐時代洛陽華化月支胡初探〉，《中國文化研究集刊》第 3 輯（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1986），頁 144-160。後收入馬小鶴，《摩尼教與古代西域史研究》（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8），頁 323-337，下文再引皆根據馬小鶴專書版本。

3 榮新江，〈小月氏考〉，《中亞學刊》第 3 輯（北京：中華書局，1990），頁 47-62。

4 翁育瑄，〈七世紀～十世紀初の中国における上流社会の家族形態——墓誌を中心に〉，《お茶の水史学》44(2000.9): 1-49。

2004 年 10 月出土於北邙山的〈支謨墓誌〉，將支竦家族研究帶入了新的發展階段。董延壽、趙振華〈唐代支謨及其家族墓誌研究〉著錄、解讀誌文，並介紹以該家族為主的唐代支姓墓誌。⁵ 西村陽子亦留心〈支謨墓誌〉，在《唐代沙陀突厥史の研究》一書中，一方面進行墓誌的譯註與考察，一方面又以墓誌所涉及的唐朝廷與沙陀的對立，探討唐末代北地區沙陀的動向問題。⁶

張葳〈唐支訥家族遷葬洛陽事考——一個小月氏胡人家族的官僚化歷程〉以支竦家族（該文稱支訥家族）的遷葬洛陽為研究重心，兼論其他支姓墓誌的問題。張氏以該家族遷葬北邙之舉為中央化、官僚化的表現，相較於北方支姓，南方支姓的漢化程度較深。⁷ 此外，支竦家族的個別墓誌方面，姚平〈會昌滅法時期的女性〉以〈支志堅墓誌〉所述誌主遭遇會昌法難的經驗，探討未婚女性與佛教的問題。⁸

關於支姓為月支人後裔一事，早已為學界所論，此處不多贅述。⁹ 但在〈支謨墓誌〉問世之後，除了前述支竦家族相關研究之外，又有學者關注到其他的支姓與支姓墓誌。2010 年毛陽光發表的〈一支洛陽月氏胡人家族的漢化經歷——以〈支彥墓誌〉與〈支敬倫墓誌〉為中心〉一文中，以

5 董延壽、趙振華，〈唐代支謨及其家族墓誌研究〉，《洛陽大學學報》21.1(2006.3): 1-10。後收入趙振華，《洛陽古代銘刻文獻研究》（西安：三秦出版社，2009），頁 504-516，下文再引皆根據趙振華專書版本。

6 （日）西村陽子，〈唐末「支謨墓誌銘」と沙陀の動向：九世紀の代北地域〉，《史學雜誌》118.4(2009.4): 1-38。後作者將對於此墓誌的研究成果收入氏著，《唐代沙陀突厥史の研究》（東京：汲古書院，2018），第 3 章〈唐末「支謨墓誌」と沙陀の動向——九世紀の代北地域——〉，頁 77-157、第 7 章〈「支謨墓誌」譯注と考察〉，頁 289-339，下文再引皆根據專書版本。

7 張葳，〈唐支訥家族遷葬洛陽事考——一個小月氏胡人家族的官僚化歷程〉，《民族研究》2012.5(2012.9): 63-73。

8 姚平，〈會昌滅法時期的女性〉，《唐代的社會與性別文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8），頁 26-34。

9 最早提出支姓為月支人姓氏的是桑原隲藏，參見（日）桑原隲藏，〈隋唐時代に支那に來往した西域人に就いて〉，該文於 1926 年初刊。後收入氏著，《桑原隲藏全集》第 2 卷（東京：岩波書店，1968），頁 347。關於桑原氏以後提及支姓之諸論著，參見馬小鶴，〈隋唐時代洛陽華化月支胡初探〉，頁 324-325。

居住洛陽的支彥、支敬倫祖孫為考察對象，探討月支胡家族的漢化歷程。¹⁰同一年發表的支靜「小月氏歷史考述」與魏樂樂「兩漢迄唐徙居內地月氏人研究」兩篇學位論文，前者探討兩漢至南北朝的支姓發展，但未及於唐代；¹¹ 後者則將探討時間延長至唐代，雖列出包括支竦家族在內的支姓墓誌，但討論仍屬簡略。¹² 很明顯地，〈支謨墓誌〉的出土問世，帶動了一波研究支姓的熱潮。

如前所述，筆者早先即已關注支竦家族課題，但在〈支謨墓誌〉出土之前，學界對於該家族的認識，其實是有限的。主要是家族中的高官，鴻臚卿致仕的支竦，其神道碑未能留傳後世。而成為武寧（感化）軍節度使的支詳，也未留下任何傳記資料，只有兩唐書、《通鑑》等零星的記載。家族無一人在正史上留下傳記的情況下，加上家族墓誌群亦缺乏上述兩名高官的碑誌，使得該家族的研究，因受限於史料不足，以致遲遲未能有所進展。

不過，在〈支謨墓誌〉出土問世，史料增加的情況下，筆者以為實有助於進行該家族的研究。雖然已有前述諸氏對於該家族與相關課題的討論，但筆者仍以為尚有不足之處，觀點也有再斟酌之必要。因此，筆者嘗試在諸先行研究的成果基礎上，結合墓誌與其他史籍的零星記載，加以各種不同角度的考察，深入探討支竦家族的相關課題。

二、支氏家族的先世與家族成員

以支竦直系為主的支氏家族（以下皆統稱為「支氏家族」），目前所見墓誌拓片共 11 件，由支竦之父、祖與其子女、子媳、孫女等成員所構成（參見表一「支竦家族墓誌一覽表」）。其中支光、支成、支志堅、支君妻崔氏、支訥妻鄭氏等五方墓誌原石藏於千唐誌齋，〈支訥墓誌〉的原

10 毛陽光，〈一支洛陽月氏胡人家族的漢化經歷——以〈支彥墓誌〉與〈支敬倫墓誌〉為中心〉，《華夏考古》2010.4(2010.12): 126-145。

11 支靜，「小月氏歷史考述」（西安：陝西師範大學民族學碩士學位論文，2010）。

12 魏樂樂，「兩漢迄唐徙居內地月氏人研究」（西安：西北大學歷史學碩士學位論文，2010）。

石則藏於洛陽古代藝術館。據郭玉堂《洛陽出土石刻時地記》（以下簡稱《時地記》）記載，該家族中的支光、支成、支詢、支志堅、支君妻崔氏、支訴妻鄭氏等六方墓誌於 1927 至 33 年之間，先後出土於洛陽北十五里南石山村北地，因此斷定「此地曾先後出土支氏墓誌多方，應為其塋地」。¹³

此處需要特別說明的是〈邕州長史支君妻崔氏墓誌〉，《時地記》題為「唐朝散大夫攝邕州長史兼監察御史上柱國瑯琊王公夫人崔氏墓誌銘并序」，¹⁴ 各墓誌拓片集與氣賀澤保規編《唐代墓誌所在總合目錄》皆因此載此誌為「王君妻崔氏」。¹⁵ 但觀察該誌拓片，所謂的「王」字之處，其實有損傷痕跡。而《時地記》之所以記載為「王」，不外乎是以其郡望「瑯琊」所下的判斷。筆者則是根據墓誌內文所載，推斷崔氏之夫的姓氏應為「支」而非「王」，理由詳述於後。

此外，《時地記》尙載有一方〈支訴墓誌〉，只載「咸通七年十二月 洛陽出土」，並未述及其他，此誌拓片亦不見載於各墓誌集。¹⁶ 筆者頗疑「支訴」實為「支訢」之誤，為上述諸墓誌中〈支訢妻鄭氏墓誌〉誌主鄭氏之夫。但據〈支訢妻鄭氏墓誌〉載咸通十二年（871）鄭氏亡時，支訢尙在，因此未能斷定〈支訴墓誌〉是否為該家族的墓誌。

該家族墓誌群中出土時間最晚，亦是目前所見下葬時間最晚的〈支謨墓誌〉，2004 年 10 月出土於孟津縣南陳庄村，其地東南毗鄰南石山村，也就是前述支氏家族墓地。墓誌原石藏於洛陽大學圖書館，誌文則公開於前引董延壽、趙振華合撰文中。¹⁷

（一）先世

關於支氏家族的先世，〈支光墓誌〉、〈支叔向墓誌〉兩誌載其先為瑯

13 郭培育、郭培智主編，《洛陽出土石刻時地記》（鄭州：大象出版社，2005），頁 375-376、382-383、394。

14 同上註，頁 383。

15 （日）氣賀澤保規編，《新編 唐代墓誌所在總合目錄》（東京：明治大學東アジア石刻文物研究所，2017），頁 414，編號 10872。

16 郭培育、郭培智主編，《洛陽出土石刻時地記》，頁 386。

17 趙振華，〈唐代支謨及其家族墓誌研究〉，頁 504-516。

耶人，支光是後趙司空支雄的七世孫。家族原居關中的雲陽，永嘉之亂時期遷徙江南，以蘇州嘉興縣風俗淳美，遂以此地為家。¹⁸《元和姓纂》則引劉宋何承天《姓苑》載「今琅琊有支氏」，又引〈石趙司空支雄傳〉載「其先月支人也」。¹⁹

支雄方面，馬小鶴指出從支雄活動的年代至支光時期，經過四百多年，不可能只傳了七世。且支氏乃月氏後裔，郡望當為假托。²⁰西村陽子則以支雄乃五胡十六國時期活躍於華北的人物，從〈支光墓誌〉載其家於西晉永嘉之亂時期遷徙江南一點，認為該家族主張自己為支雄子孫之說，難以成立。

此外，〈支子珪墓誌〉又提到東晉高僧支遁（道林）。²¹《元和姓纂》雖載其為天竺人，²²但馬小鶴指出支道林疑非異族，且僧侶有後代的可能性不高。²³沿襲馬小鶴觀點的張葳，又加入毛陽光所論支敬倫（非支疎家族成員，為居住洛陽的其他支姓）改貫陳留一事（支道林為陳留人），提出支姓「表現出對漢文化價值取向迎合」的說法。²⁴

而支姓與郡望瑯琊（琅邪）的關連方面，漢武帝時小月氏右苴渠王封於該地，為目前所見之早期記載，此點已為學界所指出。²⁵但魏晉至隋唐時代所見的支姓活動地點，卻多在關中及其鄰近地區，榮新江因此而論「除了留在琅邪的支氏外，琅邪的月氏後裔又西遷入關中。支雄就是其中的代表」。²⁶

綜合上述諸氏觀點，首先，筆者贊同西村陽子所論，實無法斷定支雄是否為支氏家族的祖先，只能說該家族是以琅邪為郡望的月氏人後裔。而

18 周紹良主編，《唐代墓誌彙編》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大中 109，頁 2336、大中 111，頁 2338-2339。

19 唐·林寶，岑仲勉校注，《元和姓纂》，卷 2〈五支〉，頁 79。

20 馬小鶴，〈隋唐時代洛陽華化月支胡初探〉，頁 327。

21 周紹良主編，《唐代墓誌彙編》下，大中 114，頁 2340。

22 唐·林寶，岑仲勉校注，《元和姓纂》，卷 2〈五支〉，頁 79。

23 馬小鶴，〈隋唐時代洛陽華化月支胡初探〉，頁 327。

24 張葳，〈唐支訥家族遷葬洛陽事考——一個小月氏胡人家族的官僚化歷程〉：70。

25 魏樂樂，「兩漢迄唐徙居內地月氏人研究」，頁 38。

26 榮新江，〈小月氏考〉，頁 47-62。

支道林與支姓之間的關係顯然更為薄弱。其次，既然無法斷定支雄是否為支氏家族的祖先，也就無法確定該家族是否真的與琅邪這個地方有關，反倒是該家族於永嘉之亂時期自關中遷居江南一點，可信度相當高。

（二）家族成員

關於支竦的子女，不同時期的墓誌，記述各有不同。尤其是支竦兒子的人數與名字，前後不一，似乎是有人改過名字。最早注意到這一點的是馬小鶴，〈支謨墓誌〉尚未出土問世之前，他就已經提出支誨可能是支謨或支訢的看法。²⁷ 公開〈支謨墓誌〉誌文的趙振華，則排除改名的可能性，直接將這些名字視為個別的存在，認為支竦兒子「共十五人」。²⁸ 張葳沿襲趙氏的說法，也說支竦兒子「大約十五人」。²⁹ 西村陽子則是以支訢與支訢為同一人。³⁰ 面對各家不一的說法，為了方便理解問題所在，以下列出諸墓誌所載內容，筆者企圖透過爬梳史料的過程，嘗試還原事實真相。

1. 支謨原名支誨？

根據〈支成墓誌〉、〈支叔向墓誌〉、〈支子璋墓誌〉的記載，大中十年（856）支竦兒子在世八人的排行順序應為「訥—誨—讓—訢—詡—謙—讚（諺）—諗」無誤。年齡方面，〈支子璋墓誌〉稱「訥、誨、讓、訢」四人為兄，「詡、謙、諺（讚）、諗」四人為弟。³¹ 而支謨大支子璋六歲，因此首先排除比子璋年幼的四位弟弟。

歿於咸通二年的支志堅，據其墓誌所載，支竦妻譚氏亡於大和三年（829），這一年也是支謨出生之年。³² 〈支謨墓誌〉載其出生後不久，生母

27 馬小鶴，〈隋唐時代洛陽華化月支胡初探〉，頁 328-331。

28 趙振華，〈唐代支謨及其家族墓誌研究〉，頁 513。

29 張葳，〈唐支訥家族遷葬洛陽事考——一個小月氏胡人家族的官僚化歷程〉：68。

30 參見（日）西村陽子，〈唐代沙陀突厥史の研究〉，第 3 章〈唐末「支謨墓誌」と沙陀の動向——九世紀の代北地域——〉，「系譜二、支氏系譜」，頁 88-89。

31 周紹良主編，〈唐代墓誌彙編〉下，大中 110，頁 2337-2338、大中 111，頁 2338-2339、大中 113，頁 2339-2340。

32 同上註，咸通 020，頁 2393。

譚氏即亡歿。他與其弟支詳感情融洽，繼母崔氏「視之若一」。³³ 可知支詳排行支謨之後，並且兩人年齡相近。至於支訢，以其妻鄭氏的墓誌所載，筆者不認為他是支謨或支詳，此點詳述於後。以此推斷支謨為支誨，支詳為支讓，其合理性相當高。

此外，唐人墓誌多有庶生子女的記載，筆者雖然不能斷定支謨以下諸弟的生母為何人，但以〈支子璋墓誌〉載其母為崔氏，「訥、誨、讓、訢」為其兄一點，³⁴ 至少可以推斷支讓、支訢的生母絕非譚氏，有可能就是崔氏。

但是，由支謨所撰寫的〈支志堅墓誌〉，卻見到以下的記載：

長兄裕，早世；防，終澤州端氏令；愛弟向，終鄂州司士；詢、謙少亡；
訥、誨、謨、詳、讓、訢、諺，咸在班朝。³⁵

「防」即為「叔防」，家族墓誌群中的在室女支子珪之父。「向」即為「叔向」，而「謙」於咸通二年之時已亡，但不見「詡」、「諗」兩人，卻多了「謨」、「詳」兩人。到底支謨、支詳為何人？實是難解之題。以現存墓誌所載享壽，可以確定以下的排行（以下稱「排行一」）：

支志堅（812-861）→支叔向（817-853）→支訥（823-878）→
支詢（826-842）→支謨（829-879）→支子璋（835-853）

又據前引〈支志堅墓誌〉與〈支子璋墓誌〉所載，我們可以推得出支謨、支詳以外的支氏兄弟排行如下（以下稱「排行二」）：

裕→叔防→叔向→訥→詢→誨→讓→訢→詡→謙→諺（讚）→諗

而諸誌所載個別家族成員的排行，也不一致。〈支訥墓誌〉載支訥為第四子，支詳為「仲弟」。³⁶ 〈支謨墓誌〉則載支謨為第三子，支詳為「次弟」。³⁷

33 周紹良主編，《唐代墓誌彙編》下，咸通 020，頁 2393。趙振華，〈唐代支謨及其家族墓誌研究〉，頁 504-507。

34 同上註，大中 113，頁 2339-2340。

35 同上註，咸通 020，頁 2393。

36 同上註，乾符 033，頁 2496。

37 趙振華，〈唐代支謨及其家族墓誌研究〉，頁 504-507。

〈支志堅墓誌〉中，支謨自稱是死者之「季弟」。³⁸〈支訢妻鄭氏墓誌〉中，支謨則自稱為死者之「仲兄」。³⁹

不過，對比「排行一」與「排行二」的順序，排行在支詢之後的是支謨或支誨。由此看來，支謨為支誨的可能性相當高。⁴⁰又據上述諸誌記載，至少可以確定的是，支謨為支訥之弟，支詳之兄。

但何以支謨所撰〈支志堅墓誌〉中，又載入支誨、支讓兩個名字？關於這一點，筆者以為只能從墓誌「缺字」的可能性來理解。出土墓誌缺漏字的問題，雖然未見學界有專文討論，但其實這樣的情形是存在的。如果將缺字加上，如「誨_口謨、詳_口讓」之類，或許可以解釋〈支志堅墓誌〉的記載與其他墓誌不符的問題。

2. 支詳究竟是何人？

西村陽子以支謨為支讓，支詳為支訢的看法，筆者認為有待商榷。前引〈支成墓誌〉、〈支叔向墓誌〉、〈支子璋墓誌〉、〈支志堅墓誌〉皆載支訢之名，排行於支讓之後。亡於咸通十二年的支訢妻鄭氏，墓誌載支訢時任劍南東川節度副使，檢校尚書員外郎，⁴¹從六品上。事實上，前一年的咸通十一年（870），支詳以「知四方館事、太僕卿」官銜，由朝廷指派為「宣諭通和使」（或謂「和蠻使」），前往被南詔包圍的成都，宣慰亂軍。⁴²太僕卿為從三品。無論如何，很難想像支詳會在短期間內，由從三品降為從六品上，尤其幾年後，他甚至當上武寧（感化）軍節度使。據此，筆者認為支詳與支訢是不同人，支詳為支訢之兄的可能性相當高。

38 周紹良主編，《唐代墓誌彙編》下，咸通 020，頁 2393。

39 同上註，咸通 019，頁 2392。

40 馬小鶴根據〈支訢妻鄭氏墓誌〉載支謨為「仲兄」一點，認為應該從墓誌製作時尚在的兄弟八人理解，如此一來，支謨就是支誨。但馬文撰寫於〈支謨墓誌〉問世前，因此馬氏亦論支詳與支謨並非同一人。參見氏著，〈隋唐時代洛陽華化月支胡初探〉，頁 328-331。

41 周紹良主編，《唐代墓誌彙編》下，乾符 009，頁 2476-2477。

42 宋·歐陽修，《新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76），卷 220〈南蠻中·南詔下〉，頁 6286；宋·司馬光，《資治通鑑》（北京：中華書局，1956），卷 252「咸通十一年正月」條，頁 8154-8155。

倒是亡於咸通二年的「支君妻崔氏」，其夫邕州長史為支詳的可能性還高一些。如前所述，長久以來，誌主被誤認為是「王君妻崔氏」。而西村陽子以此人為支竦繼室崔氏之妹，亦是誤解。⁴³墓誌載「夫人之長姑魯國太夫人，歸于先公鴻臚卿贈工部尚書」。⁴⁴支竦以鴻臚卿致仕，繼室崔氏，前引〈支志堅墓誌〉、〈支謨墓誌〉均載其為「魯國太夫人」。由此可知這位邕州長史妻崔氏，實為支竦的兒媳。而墓誌稱支竦繼室崔氏為誌主的「長姑」，又可知誌主為支竦繼室崔氏的姪女。

再者，誌主崔氏的年齡僅小支謨兩歲。支謨兄長的婚姻方面，除了最年長的支裕早亡，婚娶不明之外，其餘皆由墓誌記載得以確認。支叔防之妻為濟陽蔡氏，支叔向之妻為滎陽鄭氏，支訥之妻為太原王氏，支詢未娶早亡。支謨本人則是前後兩娶，前妻朱氏，繼室韋氏。以上諸人之妻皆不姓崔，以此類推，只能推測支詳為誌主崔氏之夫的可能性了。

綜合以上所論，筆者認為支誨改名為支謨，支讓改名為支詳的說法最為合理，並且支詳應該是支竦繼室崔氏所生，上述的邕州長史妻崔氏，極有可能是他的妻子。

3. 支竦到底有幾個兒子？

接著是支竦兒子人數的問題。據〈支成墓誌〉、〈支詢墓誌〉、〈支叔向墓誌〉、〈支子璋墓誌〉四件墓誌記載，首先可以確定的是，大中十年五月十八日遷葬之時，支竦有子八人在世，分別是訥、誨、讓、訢、詡、謙、諺、諗。但〈支子璋墓誌〉將「諺」記為「讚」。⁴⁵

其次，諸誌所載兄弟人數並不一致，〈支詢墓誌〉稱兄弟十一人，〈支叔向墓誌〉與〈支子璋墓誌〉則稱兄弟十二人。而遷葬之時已經死亡的兄弟人數也不一致，〈支詢墓誌〉稱三人早夭，〈支叔向墓誌〉載「裕、防、詢早世」，〈支子璋墓誌〉稱四人早亡。以支叔向與支子璋皆亡於大中七

43 (日)西村陽子，《唐代沙陀突厥史の研究》，第7章〈「支謨墓誌」譯注と考察〉，頁321。

44 周紹良主編，《唐代墓誌彙編》下，咸通019，頁2392。

45 同上註，大中110，頁2337-2338、大中112，頁2339、大中111，頁2338-2339、大中113，頁2339-2340。

年（853）一點來看，如果將支叔向也納入亡者名單，就有四人早亡。也就是說，大中十年遷葬邕山之時，有四人已亡，八人尚在。加上前述支誨為支謨，支讓為支詳的推論，因此筆者斷定支竦兒子總共有十二人。

4. 通婚對象以及其他女性家族成員

除了改名與排行的問題之外，支氏家族的通婚對象，亦值得注目。支竦前妻汝南譚氏為支志堅、支叔向、支訥、支詢、支謨之母，已見於前引諸誌。繼室崔氏，為支子璋之母，墓誌特別強調子璋有「同出女弟一人小字慶娘子」，⁴⁶ 其他人則未特別說明。不過，以〈支謨墓誌〉所述，仍然可以推斷支詳為崔氏所生。這位崔氏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她的名字載於多件家族墓誌中，大中十年諸誌載其封為「清河郡夫人」，咸通以後諸誌稱其為「魯國太夫人」。崔氏嫁給支竦的時間，當在大和三年譚氏過世之後。而〈支謨墓誌〉載其亡於「咸通末之明年」，趙振華考證為乾符二年（875），⁴⁷ 其時距離支竦離世，已有近二十年之久。

這位「魯國太夫人」崔氏是支氏家族與山東士族聯姻的第一人，亦為日後支竦的兒子們與山東士族通婚，鋪了一條路。支叔向娶滎陽鄭氏，支訥娶太原王氏，墓誌雖未對其家世多所著墨，看起來亦出自山東五姓。疑似是支詳的邕州長史支某，則是娶了自己的表姐妹崔氏。墓誌稱崔氏家世「時為名族」。⁴⁸ 崔氏曾祖崔微為「檢校駕部員外郎」，祖父崔勉為「侍御史」，筆者頗疑其為幕職官。因為唐代幕職官常見帶有「檢校」郎官的頭銜，⁴⁹ 或是「攝」、「兼」御史的頭銜。⁵⁰ 加上其父崔敬章任「隨州錄事參軍」，此家族的官階當屬於任職於地方的中層文官。⁵¹ 關於崔氏與邕州長史支某的婚姻，其墓誌曰：

46 周紹良主編，《唐代墓誌彙編》下，大中 113，頁 2339-2340。

47 趙振華，〈唐代支謨及其家族墓誌研究〉，頁 508。

48 周紹良主編，《唐代墓誌彙編》下，咸通 019，頁 2392。

49 參見賴瑞和，《唐代中層文官》（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08），第 3 章〈員外郎與郎中〉，頁 228-230。

50 同上註，第 1 章〈監察御史、殿中侍御史和侍御史〉，頁 73-82。

51 關於錄事參軍，同上註，第 5 章〈司錄、錄事參軍〉，頁 329-421。

長史公稟先訓，奉慈旨，大中舊曆之十四年冬十月，自西秦結褵于東平焉。公身計屢空，託跡恩諾，纔及廟見，攜家邕南，方克從知，遽屬蠻亂……。⁵²

墓誌何以謂大中十四年（860）？實因那一年十一月才改元「咸通」，而兩人成婚於十月，所以墓誌仍稱大中十四年。支某奉父母之命，迎娶表姐妹崔氏，而崔氏當時已經二十九歲了。此時父親支竦已亡，故墓誌稱「稟先訓，奉慈旨」。墓誌以前秦符登之妹東平公主下嫁西秦乞伏乾歸之典故，比喻這段婚姻，此又為該家族重視與山東士族聯姻之一證。才完成「廟見」之禮，誌主即隨夫赴任邕州，但遇上「蠻亂」，一家大小踏上逃難之旅。有關「蠻亂」，將置於第五節討論。

至於支訢妻鄭氏，其墓誌詳述鄭氏的家世如下：

鄭氏源流清絕，簪組蟬聯，為山東四族之甲。其先君名滔，終西臺殿中侍御，娶漢南節度使李文公翱之嫡女。時文公有重名大價，顯於中朝，殿院同好四、三人皆鼎鼐上流，科第名士，先選中於殿院之下，方適意於文公之門。義者以殿院為諸婿之儀表，而殿院無子弟，李夫人祇生訢新婦三人姊妹三人。⁵³

可知鄭氏之父鄭滔，以其家世背景與科考表現，為山南東道節度使、古文大家李翱所中意，得娶李翱嫡女。⁵⁴ 而這位嫡女李夫人生了鄭氏姊妹三人。墓誌稱鄭氏家世「為山東四族之甲」，並且詳細地介紹她的父母雙方，反映了該家族對於與山東士族聯姻之重視程度。

墓誌又載鄭氏與支訢成婚於咸通七年（866），生一子百日內夭折，以後臥病，咸通九年（868）由長安返回洛陽醫病，至咸通十二年過世為止，居住於支氏行脩里宅。墓誌載其「有別出二男曰大鼎、小鼎，一女曰多娘，

52 周紹良主編，《唐代墓誌彙編》下，咸通 019，頁 2392。

53 同上註，乾符 009，頁 2476-2477。

54 誌文稱「漢南節度使」，馬小鶴〈隋唐時代洛陽華化月支胡初探〉考證為「山南東道節度使」（頁 328）。又據張藏〈唐支訢家族遷葬洛陽事考——一個小月氏胡人家族的官僚化歷程〉指出，《新唐書》〈宰相世系表〉載滎陽鄭氏北祖有一未錄官職的鄭滔，未能確定其是否為支訢妻鄭氏之父（頁 68 註 4）。

纔十歲」，由其年歲推斷，可知支訢與鄭氏成婚之時，已生有庶生子女三人。⁵⁵

唐代後期見到不少墓誌記載誌主結婚時已生有庶生子女，顯見當時門第婚姻所需具備的條件限制下，造成部分士族男性的「晚婚」傾向。此點筆者曾經撰文探討，此處不多贅述。⁵⁶而鄭氏因產子造成長期臥病的情況，也告訴我們在古代，生育對於女性而言，往往伴隨著極高的風險。⁵⁷

從上述墓誌對於通婚對象的家世大書特書之舉，加上支竦繼室崔氏在家族中的崇高地位，反映了該家族極度重視與山東士族的聯姻。山東士族在整個唐代社會地位的崇高，即便並非位居高官，仍是許多官僚急欲爭取通婚的對象，此處不多加說明。支氏家族努力打入洛陽上層士族圈，由此可見。

至於支謨，前娶朱氏，後娶韋氏，皆出自官宦家庭。墓誌說前妻朱氏其家三代以「開元禮舉」入仕，繼室韋氏為「京兆縣君，皐之孫」，⁵⁸其祖父當是貞元年間居西川節度使之任，以鎮守西南，招撫群蠻有功，被封為南康郡王的韋皐，⁵⁹此點已為趙振華所指出。⁶⁰支謨兩娶皆非山東士族，可能與他久任京官，長期待在長安有關。他的經歷，將留待第三節討論。

通婚對象之外，支竦家族墓誌亦見到幾位未婚而亡的女兒。兩位未婚早亡的在室女支子璋、支子珪，身分雖為姑姪，但姪女子珪（小號令令）較其姑子璋（小號復娘）年長一歲。子璋為支竦繼室崔氏所生，可知支竦前後兩娶，兩位妻子所生子女年齡差距頗大。

55 周紹良主編，《唐代墓誌彙編》下，乾符 009，頁 2476-2477。

56 翁育瑄，〈唐代における官人階級の婚姻形態——墓誌を中心に〉，《東洋學報》83.2 (2001.9): 131-159。

57 關於古代女性的生產問題，參見李貞德，《女人的中國醫療史——漢唐之間的健康照顧與性別》（臺北：三民書局，2008），第 3 章〈生產之道與女性經驗〉，頁 71-134。

58 關於開元禮舉，參見張文昌，《唐代禮典的編纂與傳承——以《大唐開元禮》為中心》（臺北：花木蘭文化公司，2008），頁 171-186。

59 關於韋皐，參見後晉·劉昫，《舊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76），卷 140〈韋皐傳〉，頁 3821-3826。宋·歐陽修，《新唐書》，卷 158〈韋皐傳〉，頁 4933-4937。

60 趙振華，〈唐代支謨及其家族墓誌研究〉，頁 507。

支竦前妻譚氏所生，年齡較長的女兒「支鍊師」，法號志堅，小字新娘子。九歲即出家，但「不居伽藍」。⁶¹ 會昌五年（845）七月，武宗詔毀天下佛寺，僧尼並敕還俗。志堅時年三十三歲，墓誌載其「中塗佛難，易服玄門」。⁶² 墓誌稱其為「鍊師」，為其由佛教改宗道教之證。⁶³ 由於長期居家，志堅亦擔負起照顧家人之責，其墓誌曰：

自大中七載，鄂州房傾落之際，託其主孤，猶女孀婦，不離瞬息。⁶⁴

「鄂州房」為於鄂州司士參軍任內「一夕暝于江夏之官舍」的支叔向一家。叔向過世時有「稚女掾娘，嬰男駢兒、湘兒皆乳哺」。⁶⁵ 可知叔向這一房的孤兒寡婦，日後由其姊志堅負責照顧。墓誌稱叔向為「愛弟向」，顯見姊弟感情深厚。

三、支氏家族的仕宦經歷

關於支氏家族成員的仕宦經歷方面，該家族因無一人在正史上留下傳記，所以墓誌就成為研究該家族的重要史料。此外，少數如正史等史料亦可以作為研究該家族的輔助材料。以下藉由爬梳家族成員之仕宦經歷，深入探究其與該家族發展的關係。

（一）支竦與其先世的經歷

支竦的祖父支光，不論是墓誌序或是內容，都只提及江州尋陽縣丞的經歷，據此推斷支光最終官至縣丞。墓誌敘述支光任官之成就，除了政通人和之外，又強調「莅官以文學緣飾」，⁶⁶ 顯示他作為文官的特質。支光祖父支元亨為「普安郡司馬」，父親支敏為「攝廣州司馬」。所謂「攝」，

61 周紹良主編，《唐代墓誌彙編》下，咸通 020，頁 2393。

62 同上註，咸通 020，頁 2393。

63 關於〈支志堅墓誌〉與會昌法難，參見姚平，〈會昌滅法時期的女性〉，頁 26-34。

64 周紹良主編，《唐代墓誌彙編》下，咸通 020，頁 2393。

65 同上註，大中 111，頁 2338-2339。

66 同上註，大中 109，頁 2336。

據賴瑞和的解釋，「州縣『攝』官の場合，『攝』通常表示那些由地方長官自行委任，但還未上奏朝廷的州縣官。」⁶⁷ 以上可知從支元亨至支光三代，均是任職地方的中下級官員。

支竦的父親支成，則有一番不同的經歷。張葳以〈支成墓誌〉所言「理產傳陶朱之術」，⁶⁸ 即推論該家族「曾經從事商業活動」。又以唐代後期可見到商人子弟以軍功入仕之例，加上日後支成之孫支謨具備財政官的經歷，強調其家族具備商人特質。⁶⁹

對於張氏的推論，筆者以為有再斟酌之必要。墓誌敘述支成並未任官，本身精通占卜與《左傳》，平日經營家業，常資助鄉人婚喪喜慶，席間發表之言論為鄉人所服，他若不光臨鄉里宴會，其家便感到羞愧，席間失色之類，⁷⁰ 可知其在鄉里的地位。支成經營家業有成，是否可以視之為商人？以其曾祖以來三代仕宦的情況來看，很難遽然斷論其家世業商。但從墓誌得知他是在地領袖這一點，是不容置疑的。至於支成之孫支謨，如後述所示，墓誌未見其他兄弟任職財政官員的跡象，似乎只有支謨的經歷較為特殊。

其次，墓誌後半段提及支成鑽研孫吳兵法，並於建中年間「戡難于奉天」，因功獲贈隨州刺史等官銜之事。⁷¹ 建中年間多起藩鎮反叛事件中，影響唐中央政府最為劇烈的，就是建中四年（783）十月德宗赴奉天避難，亂兵擁朱泚據長安稱帝之事件。當時支成年僅二十七歲。但兩唐書與《通鑑》對於朱泚之亂的記載，皆未見述及支成「戡難」之隻字片段，甚為可惜。墓誌之記載，當可作為朱泚之亂時地方動態之補充史料。

馬小鶴以此家族曾居雲陽一點，論「雲陽當位於關中，距離奉天不遠，支成才得以戡難」，並且提出此次動亂有不少異族人士參與其中，加

67 賴瑞和，《唐代中層文官》，第1章〈監察御史、殿中侍御史和侍御史〉，頁78。關於「攝」官，另可參見賴瑞和，〈論唐代的州縣「攝」官〉，收入杜文玉主編，《唐史論叢》第9輯（西安：三秦出版社，2007），頁66-86。

68 周紹良主編，《唐代墓誌彙編》下，大中110，頁2337-2338。

69 張葳，〈唐支訥家族遷葬洛陽事考——一個小月氏胡人家族的官僚化歷程〉：65-66。

70 周紹良主編，《唐代墓誌彙編》下，大中110，頁2337-2338。

71 同上註。

以佐證。⁷² 對此，筆者認為該家族遷居江南已久，很難說他們與故居雲陽還維持著什麼樣的連繫。但以支成身為地方領袖的情況，也有組織地方自衛武力的可能性。事實上，唐代中後期的史料已經出現名為「土團」的地方自衛武力，並且被引用於平定地方叛變。⁷³ 但由於墓誌並未詳述「戡難」經過，很難判斷到底是何種規模與型態的軍事武力。

支光、支成兩墓誌的作者皆是「前鄉貢進士朱賀」，文體亦同為半駢半散的寫作方式，但〈支成墓誌〉對於誌主生平經歷的描述，明顯地較〈支光墓誌〉詳盡許多。這反映了擔任遷葬的支訥這一輩，對於曾祖父支光的事蹟，了解不深的事實。

至於支竦的經歷，目前僅知有令狐緒所撰〈支竦神道碑〉，⁷⁴ 但碑文未留傳後世，因此只能勘察其他史料，加以佐證，而家族成員墓誌記載就是最重要的管道。據〈支成墓誌〉、〈支詢墓誌〉記載，支竦歷任雲、瀘、齊、光、邢五州刺史、鄆王傅，鴻臚卿致仕。⁷⁵ 〈支叔向墓誌〉則是將「鄆王傅」載為「東朝親王傅」。⁷⁶ 其次，支竦有同母兄支靖，官至「沂州司馬」，同母弟支曾，官至「登州長史」。兄弟三人中只有支竦位至高官，或許其他兩人皆早逝也說不定。

由大中十年以後死亡的家族成員墓誌，又可得知支竦獲贈「工部尚書」、「僕射」、「司空」等官銜，當是隨著其子支謨、支詳等日後升官之際，屢次獲得朝廷所贈之官銜。

支竦歷任的五州刺史方面，雲、瀘兩州置下都督府，齊、光、邢三州均屬上州，上州刺史為從三品。任期方面，會昌二年（842）支詢亡於瀘州，大中四年（850）支子珪歿於光州郡齋，由此可以確認支竦任職瀘州、光州刺史的時間點。

至於支竦任邢州刺史、鄆王傅的時間點方面，杜牧撰有〈支某除鄆王

72 馬小鶴，〈隋唐時代洛陽華化月支胡初探〉，頁 330。

73 關於「土團」，參見王壽南，〈唐代藩鎮與中央關係之研究〉（臺北：大化書局，1978），第 5 章〈唐末藩鎮之本質與其跋扈之態度〉，頁 259-260。

74 周紹良主編，〈唐代墓誌彙編〉下，大中 110，頁 2337-2338。

75 同上註，大中 110，頁 2337-2338、大中 112，頁 2339。

76 同上註，大中 111，頁 2338-2339。

傳盧賓除融州刺史趙全素除福陵令等制》，⁷⁷ 可知此制中的「支某」，就是支竦。杜牧於大中五年（851）秋由湖州刺史轉任考功郎中、知制誥，翌年遷中書舍人，同年十一月卒於長安安仁坊宅中。⁷⁸ 支竦由邢州刺史遷任鄆王傅，當在大中五年秋天至大中六年（852）的這段期間。而此制載支竦任邢州刺史時亦兼充本州團練使，肩負使職頭銜的刺史，其地位與重要性皆高於一般普通的州刺史。⁷⁹

其次，鄆王就是日後即位的懿宗，宣宗長子，原名溫，以不受寵之故，一直未被立為太子。直至大中十三年（859）八月，宣宗駕崩之際，左軍中尉王宗實、左軍副使元元實發動政變，矯詔立鄆王溫為皇太子，改名灌後即位。⁸⁰ 但在這之前的大中十年〈支叔向墓誌〉已載其父為「東朝親王傅」，似乎鄆王早已被朝中大臣視為是太子的必然人選。支竦任鄆王傅與死亡均在懿宗立太子之前，但由支訥兄弟日後仕途發展順遂之事看來，支竦的這個經歷對他的兒子們多少有些加分作用。

最後是任職鴻臚卿的時間點方面，〈支謨墓誌〉載曰：

父竦，歷郡守王官，分司告老，以鴻臚卿致仕，累贈司空。⁸¹

可知支竦最終任職東都分司，以鴻臚卿致仕。女兒支子璋於大中七年歿於東都永泰里，也說明了支竦任職分司的時間點。不過，唐代文獻見到幾個王傅「分司東都」的例子，雖然前引杜牧所撰之制並未載明支竦任鄆王傅是否分司東都，但仍然不排除他任職分司是從鄆王傅時期開始的可能性。也就是說，支氏家族進入洛陽的時間點，有可能是在大中七年之前。在大中五年秋天至大中六年期間，支竦轉任鄆王傅的時候，一家人有可能於此時遷居洛陽。

77 唐·杜牧，《樊川文集》（臺北：漢京文化，1983），卷18，頁279。

78 參見繆鉞，〈杜牧年表〉，《繆鉞全集》第5卷（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4），頁254-258。

79 參見賴瑞和，《唐代高層文官》（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16），第18章〈唐刺史和他的使職帽子〉，頁497-535。

80 宋·司馬光，《資治通鑑》，卷249「大中十三年八月」條，頁8075-8076。

81 趙振華，〈唐代支謨及其家族墓誌研究〉，頁504-516。

（二）支訥、支謨、支詳的經歷

由〈支成墓誌〉記載，可知大中十年支訥三十四歲、支誨（謨）二十八歲之時，兩人均已任官。支讓（詳）與支訢「通經得第」，支讓（詳）「應超絕科」。⁸² 支訢又與弟支詡、支謙「舉進士」。支諺（讚）、支諗則「補太廟齋郎」。⁸³ 此時支訥兄弟在仕途上可以說是處於起步的狀態。

到了咸通三年（862）支訥四十歲、支謨三十四歲之時，由〈支志堅墓誌〉記載可知，當時支謙已亡，其餘諸人「咸在班朝」，⁸⁴ 顯示家族成員的仕宦呈現穩定的狀態。

對於支竦兒子們的仕宦經歷，我們知道最多的，主要是支訥、支謨、支詳三人。因此，此處集中探討這三人的經歷。

1. 支訥的經歷

支訥方面，墓誌載其歷任藤、富、貴、柳等四州刺史，這四州皆位於嶺南道，地點相近，均屬下州。下州刺史為正四品下，等級並不如其父支竦所任之刺史職。支訥最後所任之「蜀亞尹」，墓誌序則題為「西川少尹」。⁸⁵ 「西川」應為「劍南西川」，劍南西川節度使亦兼任成都尹，而府有少尹，從四品下。據此推測「西川少尹」應為成都府少尹，但府少尹的品秩低於下州刺史。關於這一點，或許支訥另外領有其他使職，兼領其他中央官銜，但可惜墓誌並未記載，我們無法有更進一步的推論。

2. 支謨的經歷

支謨方面，以其墓誌字數多達近三千字，詳載誌主經歷之故，使得我們對於支謨的認識又比其他兩位兄弟多。支謨的財政官經歷，是他與其他兄弟不同之處。鑽研〈支謨墓誌〉的西村陽子，從「財務運送體制」角度分析北方局勢，認為這是作為「經濟官僚」的支謨何以為朝廷所起用，

82 超絕科為吏部書判之等第，參見後晉·劉昫，《舊唐書》，卷 137〈于邵傳〉，頁 3765。
宋·歐陽修，《新唐書》，卷 203〈于邵傳〉，頁 5783。

83 周紹良主編，《唐代墓誌彙編》下，大中 110，頁 2337-2338。

84 同上註，咸通 020，頁 2393。

85 同上註，乾符 033，頁 2496。

派往前線鎮壓沙陀叛變的主因。⁸⁶ 由於西村氏已撰文分析支謨所任「司農寺丞、兼專知延資庫官事」與「太府少卿、知度支左藏庫出納官」二職，⁸⁷ 此處不再贅述。以下筆者討論支謨除了財政官以外的經歷，並著重於與家族有關的部分。

依據西村氏的整理，我們知道支謨約在大中五年得到「外叔祖將作監崔公」的幫助，求得「內作使判官」一職。以後經歷家令寺主簿（充三宮營繕）、家令丞、司農寺丞（專知延資庫官事）、天德軍副使（除侍御史、內供奉），後加檢校庫部郎中（兼御史中丞），之後又任太府少卿（知度支左藏庫出納官）。咸通末年，任濮州刺史。乾符年間歷經服喪（繼母崔氏之喪），之後任右金吾衛大將軍、知街事。乾符五年（878）以本官「檢校左散騎常侍、充河東節度副使、指揮制置使」，後移大同宣諭。乾符六年（879）夏，任大同軍都防禦、營田、供軍等使（兼任雲州刺史等職），後轉左散騎常侍、司農卿，同年十二月卒。⁸⁸

首先，支謨得到「外叔祖將作監崔公奏署為內作使判官」一事。這是唐代士族透過婚姻關係，在仕途上彼此提攜的實例。關於這位「崔公」，趙振華以其為元和年間任黔中觀察使、嶺南節度使的崔能。⁸⁹ 但據王壽南考證，崔能於元和十五年（820）由將作監轉任嶺南節度使，並於長慶三年（823）卒於任內。⁹⁰ 因為支謨是在他死後才出生的，筆者得以據此推斷「外叔祖將作監崔公」實另有其人。

其次，長期京官的資歷，使得他得以就近料理家族的喪葬事務。據〈支志堅墓誌〉所載，可知咸通三年任職延資庫的支謨請假回洛陽料理其姊支志堅之喪事。墓誌提到支謨與支詳「未遂迎覲」，⁹¹ 推測富州官舍至

86 （日）西村陽子，《唐代沙陀突厥史の研究》，第3章〈唐末「支謨墓誌」と沙陀の動向——九世紀の代北地域——〉，頁100-103。

87 同上註，第7章〈「支謨墓誌」譯注と考察〉，頁332-336。

88 同上註，第3章〈唐末「支謨墓誌」と沙陀の動向——九世紀の代北地域——〉，「表五、誌文から復元した支謨の官歴」，頁91。

89 趙振華，〈唐代支謨及其家族墓誌研究〉，頁507。

90 王壽南，《唐代藩鎮與中央關係之研究》，「附錄一、唐代藩鎮總表」，頁890。

91 周紹良主編，《唐代墓誌彙編》下，咸通020，頁2393。

洛陽的這段路，另有家人護喪。此外，誌主與邕州長史妻崔氏同年同月葬於邕山家族墓，崔氏的墓誌雖未註明，但可以想見兩人的喪事是同時進行的。

同樣由他撰寫的〈支訢妻鄭氏墓誌〉，誌主鄭氏死於咸通十二年，支謨奉繼母崔氏之命，代替當時任劍南東川節度副使，無法請假回洛陽的支訢，料理鄭氏的喪事。墓誌署名「仲兄前太府少卿賜紫金魚袋謨撰」，可知其時支謨已卸下太府少卿一職，正處於等待下一任的待業期。

再來是支謨任職地方的經歷方面。咸通三年司農寺丞之後，任天德軍副使，「除侍御史、內供奉，賜緋魚袋」，節度使是左金吾衛大將軍蘇弘靖。後以屯田之功，得到「計相曹公」（曹確）的賞識，升他為「檢校庫部郎中，兼御史中丞，賜紫金魚袋」。⁹² 第一次派任地方，支謨顯然得到了亮眼的成績。

第二次派任地方是咸通末年的濮州刺史。太府少卿卸任後，如前所述，支謨疑似經歷了一段居家待業期，之後才是濮州刺史「加秘書少監、忝御史中丞」。⁹³ 濮州屬上州，位於河南道。乾符二年六月，王仙芝等人攻陷濮州、曹州，天平節度使薛崇出兵迎擊，為王仙芝所敗，黃巢聚眾響應之。西村氏以為此時的濮州刺史極有可能就是支謨，但墓誌只書「明年丁內憂」，完全未提及王仙芝、黃巢之亂的發生。⁹⁴

第三次派任地方就是乾符五年的河東之任。在這之前，支謨擔任的是右金吾衛大將軍、知街事。文官出身的支謨，何以會轉任武官職務？這點實是耐人尋味，但可惜的是墓誌並未交待原因。河東之任，最初支謨以本官充河東節度副使、指揮制置使。所謂本官，應該是右金吾衛大將軍，正三品。關於節度副使，如支謨於咸通年間任天德軍副使，推估為從六品下，⁹⁵ 支謨弟支訢於咸通十二年任東川副使，應是從六品上。但此次的河東副使，卻是以高官身分擔任。可見當時河東情況危急，朝廷派駐高官應

92 趙振華，〈唐代支謨及其家族墓誌研究〉，頁 504-507。

93 同上註。

94 （日）西村陽子，《唐代沙陀突厥史の研究》，第 3 章〈唐末「支謨墓誌」と沙陀の動向——九世紀の代北地域——〉，頁 91。

95 同上註，「表五、誌文から復元した支謨の官歴」，頁 91。

對邊防局勢。同一年支謨移任「大同宣諭」。此職《通鑑》載為「大同軍宣慰使」。⁹⁶

乾符六年夏「除蔚、朔、雲三州節度使」，以後又轉為「左散騎常侍、司農卿」，該年底過世。不過，墓誌序題為「唐故大同軍都防禦、營田、供軍諸使朝請大夫檢校右散騎常侍使持節都督雲州諸軍事雲州刺史御史中丞柱國賜紫金魚袋贈工部尚書瑯琊支公墓誌銘并序」，⁹⁷從這一點來看，支謨的官銜應該是大同軍都防禦等使，兼雲州刺史，而且是到過世為止。但墓誌所載的三州節度使與左散騎常侍、司農卿，又該如何解釋？

「蔚、朔、雲三州節度使」方面，大同軍領有蔚、朔、雲三州。但不論是乾符五年被殺害的段文楚，還是接任的支謨，正確的使職名稱應該是防禦使，而非節度使。節度使與防禦使混淆的情形，亦見於其他文獻中。

「左散騎常侍、司農卿」方面，墓誌記載朝廷下令支謨轉任司農卿時，當地「三軍九姓之士」曾慰留他，兩者之間展開對話，支謨反覆思量，結果「十一月下旬告疾，十二月一日薨位」。⁹⁸但以墓誌序題為大同軍防禦使，支謨似乎是卒於轉任司農卿之前。看起來朝廷的人事命令與支謨的病逝，應是在短時間內所發生的事。也就是說，有可能是支謨接到人事命令後，還來不及轉任司農卿，就卒於大同軍防禦使任上。

如前所述，其父支竦亦曾任雲州刺史，當早於會昌二年瀘州刺史之任。雲、朔、蔚三州原隸屬河東節度使，會昌三年（843），唐朝廷於此三州置大同軍都團練使，治雲州，隔年升為都防禦使。⁹⁹支謨任大同軍都防禦使時的雲州，比起其父任職時期，顯然環境險峻許多。從朝廷付予他的諸使職頭銜，得以窺見雲州局勢的變化。此部分將於第五節再論。

96 宋·司馬光，《資治通鑑》，卷 253「乾符五年二月」條，頁 8198-8199。該條載李克用殺大同防禦使段文楚事件發生後，朝廷為使李國昌諭其子克用，「乃以司農卿支詳為大同軍宣慰使」。此處的「司農卿支詳」當是「司農卿支謨」之誤，而《通鑑》所載當時支謨的官銜為「大同軍宣慰使」。

97 趙振華，〈唐代支謨及其家族墓誌研究〉，頁 504-507。

98 同上註。

99 宋·歐陽修，《新唐書》，卷 65〈方鎮表〉，頁 1819。

3. 支詳的經歷

支詳方面，由於不見其墓誌，只能從家族成員墓誌與正史等記載，窺見其仕宦經歷。首先，疑似是支詳的「朝散大夫攝邕州長史、兼監察御史」支某，於大中末、咸通初任此一職。「攝」一詞的意義，如前所述，通常指地方長官自行委任州縣官的情況，有「代理」之意。至於「兼監察御史」，楊樹藩解釋「行政官兼加監察官職務者，有寵重之意」。¹⁰⁰ 賴瑞和則指出，御史為幕職官常見的兼帶官銜，僅是「加官的標籤」，並非實職。¹⁰¹

其次，其妻崔氏的墓誌稱他「身計屢空，託跡恩諾」，¹⁰² 似乎接受邕州長史一職，是出於生計的考量。邕州位於嶺南道，該州設置下都督府，以邕管經略使領之，經略使並兼任邕州刺史。下都督府長史為從五品上，這也有可能是吸引他前往邊境任職的原因（朝散大夫為從五品下）。

到了咸通十一年，支詳已經是太僕卿，從三品的身分了。假設他與崔氏（邕州長史妻）年齡相近的話，此時的他應該是四十歲左右。這一年，他的兄長支訥四十八歲，應該還在嶺南道任職下州刺史，正四品下。隔年，另一位兄長支謨四十三歲，以「前太府少卿」的身分為支訥妻鄭氏寫墓誌，太府少卿為從四品上。而弟弟支訢則任「劍南東川節度副使、檢校尚書員外郎、兼侍御史」。「兼侍御史」，如同前述，侍御史亦非實職。支訢的節度副使，應該是等同「尚書員外郎」的品秩，從六品上。

綜合上述，支詳是兄弟當中官位最高者，仕途可謂順遂。第二節提及，咸通十一年，南詔入侵成都之際，他以「知四方館事、太僕卿」的身分擔任朝廷特使，前往前線，宣慰亂軍。唐代接待外賓的「四方館」，原本屬於通事舍人的職掌，但自唐代中葉以後，開始由其他官員負責。¹⁰³ 其父支竦以鴻臚卿致仕，鴻臚寺為傳統主外賓事務之機構。支詳雖非鴻臚卿，但以太僕卿知四方館事，亦是負責外交工作。父子兩代的共通點，由此可見。

咸通十一年南詔入侵事件，後為唐軍所平定。而支詳擔任特使（宣

100 楊樹藩，《唐代政制史》（臺北：正中書局，1988），頁 142-143。

101 賴瑞和，《唐代中層文官》，第 1 章〈監察御史、殿中侍御史和侍御史〉，頁 77-78。

102 周紹良主編，《唐代墓誌彙編》下，咸通 019，頁 2392。

103 宋·司馬光，《資治通鑑》，卷 252「咸通十一年正月」條注引《晏公類要》，頁 8155。

諭通和使或和蠻使)的工作,想必成為他後來升官的契機。到了乾符年間,他成為武寧(感化)軍節度使。武寧軍節度使府於咸通三年降級為徐州觀察使,至咸通十一年十一月,復為「感化軍」節度使,¹⁰⁴但墓誌與正史等文獻皆稱支詳為武寧軍節度使。〈支訥墓誌〉撰者「門吏武寧軍節度掌書記前鄉貢進士」吳廷隱於墓誌中稱自己受「大彭尚書」提拔。「大彭尚書」當是指支詳,可知他領有尚書頭銜,正三品。以後到支詳全家遇害的中和元年(881),他又升為「僕射」,從二品。¹⁰⁵

任期方面,吳廷燮《唐方鎮年表》雖載之為乾符六年至中和元年之間,¹⁰⁶王壽南則以支詳前任薛能再任武寧節度使數月即轉任忠武節度使,將支詳任期更正為乾符五年至中和元年之間。¹⁰⁷也就是說,擔任朝廷特使後八年,乾符五年他就當上節度使。這一年的七月支訥過世,享年五十六。支謨五十歲,前往太原擔任河東節度副使,並於同年移至雲州。

支氏家族的仕宦經歷,顯示該家族在應試科舉方面,起步較晚。現存的家族墓誌並未見到支竦與其父、祖應科考的記載。支竦兩位年長的兒子,支叔向以蔭補官,支訥的墓誌未提及科考,疑似亦以蔭補官。接下來的三人,早亡的支詢是鄉貢三傳(明經),支謨、支詳都是明經及第,支訢則是明經及第後又與兩位弟弟「舉進士」。可知這個家族應試進士科,是很後面的事了。

以此來看,支謨、支詳兩人日後得以位列高官,若非以家世庇蔭,就是得靠實力競爭。當然,有力姻親的襄助,也是不能忽視的因素。如協助支謨入仕的「將作監崔公」,應該就是繼母崔氏娘家的人脈。但由支謨、支詳兄弟的經歷與表現,仍然可以發現他們具備作為官僚的實務能力。不論是支謨擁有的財政官經歷,還是支詳擅長的外交事務,都是他們得以被朝廷拔擢的重要因素。

而由支氏兄弟擔任使職的狀況,亦得以藉此觀察唐代後期士族的仕宦傾向。唐代後期藩鎮體制的形成,造成地方社會的變化,士族擔任使職、

104 宋·歐陽修,《新唐書》,卷 65〈方鎮表〉,頁 1821-1823。

105 宋·司馬光,《資治通鑑》,卷 254「中和元年八月」條稱支詳為「支僕射」(頁 8256)。

106 吳廷燮,《唐方鎮年表》(北京:中華書局,2003),頁 325。

107 王壽南,《唐代藩鎮與中央關係之研究》,「附錄一、唐代藩鎮總表」,頁 645、950。

幕職的現象越趨普遍，也影響了士族的家庭型態與家庭生活，這是第五節所要探討的課題。

四、支氏家族的遷居與遷葬活動

支氏家族原居蘇州嘉興縣，〈支成墓誌〉稱其「世家江左間」，表示該家族久居江南。墓誌又謂：「爰以從官奠厥攸居於嘉禾縣」，¹⁰⁸「從官」一語，似乎該家族居住嘉興縣（嘉禾）是緣於任官之故。「奠厥攸居」語出《尚書》〈商書·盤庚下〉，安居之意。該家族自永嘉之亂南遷，定居江南已有數代。因此，正確地說，唐代的支氏家族，其實是江南人。

〈支志堅墓誌〉提及誌主於咸通二年由洛陽遷居嶺南藤州，聽聞當地物產豐富，「不異淮浙」。¹⁰⁹所謂「淮浙」，應該就是揚州與蘇州。與揚州一樣，蘇州在唐代後期亦因運河之利而繁榮，物產豐富之外，又以紡織業聞名。¹¹⁰支氏家族的原居地嘉興縣有嘉興屯田 27 處，為唐代重要的糧產地區。¹¹¹

不過，支成過世之後，支氏家族疑似遷居揚州，權葬揚州江都的家屬數人，當為其證（詳見本節後述）。但目前所見該家族的墓誌，並未見到有人任官揚州的記載。關於這一點，張葳認為揚州距離支氏故居不遠，但這一家卻未選擇歸葬祖塋，「似乎表明其家族打算離開永嘉（嘉興）的決定是非常堅定的」。¹¹²但筆者反而傾向於從交通便利、生活機能佳的出發點，推測該家族因此選擇了揚州的城居生活，進而權葬當地。

揚州以運河交通之利，在唐代後半期繁榮至極。¹¹³揚州城有子城與羅

108 周紹良主編，《唐代墓誌彙編》下，大中 110，頁 2337-2338。

109 同上註，咸通 020，頁 2393。

110 關於唐代蘇州的經濟發展，參見朱祖德，《唐五代兩浙地區經濟發展之研究》（臺北：花木蘭文化公司，2009），第 3 章〈兩浙地區的經濟發展〉，頁 43-110。

111 「嘉興屯田」記載於唐·李翰，〈蘇州嘉興屯田紀績頌〉，收入清·董誥等編《全唐文》（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卷 430，頁 1937 上-1937 下。

112 張葳，〈唐支訥家族遷葬洛陽事考——一個小月氏胡人家族的官僚化歷程〉：67。

113 關於唐代揚州的經濟，參見全漢昇，〈唐宋時代揚州經濟景況的繁榮與衰落〉，《中央研

城之分，子城（又稱牙城）內集結以淮南節度使府為中心的各種官衙，羅城為商業住宅區，貫穿羅城南北的合瀆渠，將城內分治江都、江陽兩縣。¹¹⁴ 支氏家族墓誌載權葬地點是「江都邑之偏」，可能是指江都縣轄下的揚州城郊外。

世居江南的支氏家族，以支竦任官緣故遷居洛陽。如第三節所述，有可能是在大中五年秋天至大中六年期間。大中七年支子璋歿於洛陽永泰里，支訢妻鄭氏與支訢兩人則分別於咸通十二年、乾符五年過世於洛陽行脩里。可以推測支竦生前居住於永泰里，在他過世後，一家人又遷居至行脩里。永泰里位於南市之東側，貞觀九年（635）自南市析出設坊。¹¹⁵ 行脩里則是遠離南市的官員住宅區。¹¹⁶

據家族墓誌記載顯示，支光、支成、支叔向、支詢、支子璋、支子珪等六方墓誌載其同葬於大中十年五月十八日。支志堅、支君妻崔氏等兩方墓誌載其同葬於咸通三年十月八日。其餘分別是葬於乾符三年（876）的支訢妻鄭氏，葬於乾符六年的支訢，以及葬於廣明元年（880）的支謨。

支氏家族於大中十年五月十八日所進行的大規模遷葬活動，是該家族最受學界關注的課題之一。關於遷葬的動機，馬小鶴強調洛陽與絲路關係密切，為西域人聚居與安葬之所。¹¹⁷ 張葳則認為該家族的商人背景，導致其「故土觀念的淡漠」，以及「崇北抑南的文化取向」，隨著家族官僚化程度加深，而努力接近國家政治中心。¹¹⁸ 馬小鶴的民族因素考量，張葳的商人之說，皆有其立論根據。但筆者以為此家族久居江南，漢化已深，民族因素似乎過於薄弱。而家族經商的證據，僅止於支竦之父支成一例，

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11(1947.9): 149-176，後收入氏著，《中國經濟史論叢》（香港：新亞研究所，1972），頁 22-26。

114 關於唐代的揚州城，參見（日）愛宕元，《唐代地域社會史研究》（京都：同朋舍，1997），華中篇・第 2 章〈唐代的揚州城とその郊區〉，頁 357-413。

115 清・徐松撰，李健超增訂，《增訂唐兩京城坊考》（西安：三秦出版社，1996），卷 5 〈東京・外郭城〉，頁 329。

116 參見（日）妹尾達彥，〈隋唐洛陽城の官人居住地〉，《東洋文化研究所紀要》133 (1997.3): 67-111。

117 馬小鶴，〈隋唐時代洛陽華化月支胡初探〉，頁 331-334。

118 張葳，〈唐支訢家族遷葬洛陽事考——一個小月氏胡人家族的官僚化歷程〉：67-68。

反倒是仕宦傳統，還較為明顯。再者，目前所知的遷葬對象，如下所示，僅限於支竦直系，未見其他旁系。因此，筆者認為應該將焦點，放在帶領該家族進入洛陽的關鍵人物——支竦的考察上。

大中十年的大規模遷葬活動，是根據支竦遺言所進行的。他囑咐其子支訥，遷葬祖塋於邙山。〈支光墓誌〉曰：

初，鴻臚卿（支竦）以讓爵諧志，將營菟裘，視周漢舊邦，悅邙鞏固秀，爰顧嗣子訥曰：「如我死則必葬我於邙山之下。」申命之曰：「吾思得陪祖禰壤兆之後，汝當上遷五世，從窆於斯，而為支氏阡也。」¹¹⁹

可知支竦希望自己死後葬於邙山，並要求遷葬五世於此，子嗣遂遵從其遺願進行大規模遷葬。類似的敘述亦見於〈支成墓誌〉：

初，鴻臚公致政之歲，居于東周，仰嵩邙之奇峻，濯伊洛之清深，顧謂令嗣曰：我樂於斯，死當葬我，因是亦奉遷祖禰於吾兆之前，庶隆阜崗，可以永固。¹²⁰

上述說明支竦個人喜愛洛陽的環境，希望死後葬於此地。

如前所述，支竦有壽州刺史令狐緒為其所書之神道碑。但這個立於地面上的神道碑，顯然未能留傳於後世，以致我們無法據其內容，對此家族有更進一步的探討與研究，甚為可惜。但是從大中十年五月十八日進行大規模遷葬一事，仍然可以推斷支竦本人應亡於大中十年五月之前，或許是大中九年也說不定。

大中十年五月十八日的大規模遷葬，支竦的遺言是遷葬五世，但據支竦之子〈支叔向墓誌〉所載，實際上是「高祖暨公及子齊六代廿五喪」。¹²¹也就是說，遷葬對象為支竦的曾祖父支敏、祖父支光、父支成，加上支竦本人與其子女支叔向、支詢、支子璋、孫女支子珪等六個世代。至於「廿五喪」，除了上述八人，還應包括支敏之妻趙氏、支光之妻沈氏、支成之

119 周紹良主編，《唐代墓誌彙編》下，大中 109，頁 2336。

120 同上註，大中 110，頁 2337-2338。

121 同上註，大中 111，頁 2338-2339。

妻顧氏、繼室曹氏，支竦之妻譚氏等五人。而〈支叔向墓誌〉又載其兄弟三人早世，除去已留下墓誌的支詢之外，尚有支裕、支叔防兩人。¹²² 以上總計十五人。

其餘十人方面，首先是未嫁即亡的在室女。目前僅知此「廿五喪」內含支竦之女支子璋、孫女支子珪兩喪，是否還包括其他的在室女？不得而知。其次是支竦的兄弟，〈支成墓誌〉載支竦尚有同母兄弟支靖與支曾，但目前出土的墓誌只見到支竦的子孫。¹²³ 此「廿五喪」是否包括支竦的兩位兄弟與他們的家人？亦不得而知。

總之，目前所見諸誌是以支竦一系為主，未見其兄弟等旁系親屬，且〈支叔向墓誌〉又言遷葬高祖以下六代，在無其他出土墓誌資料佐證之情況下，筆者暫時推定此次遷葬應是以支竦一系為主。

遷葬洛陽邙山之前，支竦之祖父支光葬於「嘉興縣學秀村」，¹²⁴ 父親支成則葬於「嘉興縣永樂鄉」。¹²⁵ 關於永樂鄉，《至元嘉禾志》載「永樂鄉在縣西北十五里」。¹²⁶

除了原葬於蘇州的父祖之外，遷葬行列也包括權葬於揚州的幾位家屬。支竦繼母曹氏於開成元年（836）「卒於揚州，權殯于江都邑之偏」，¹²⁷ 是第一位葬於揚州江都的家族成員。接下來的幾位未成年死亡之家族成員，並非卒於揚州，卻都葬於揚州江都。支竦之子支詢於會昌二年「終於瀘州，旅櫬沿巴蜀江至揚州，藁殯於江都邑之偏」，¹²⁸ 墓誌稱其棺柩由巴蜀下長江至揚州，亦可以想見選擇權葬揚州，是有交通上的考量。支竦孫女支子珪於大中四年「終於光州郡齋……久滯殯於揚州江都邑之偏」。¹²⁹

122 周紹良主編，《唐代墓誌彙編》下，大中 111，頁 2338-2339。

123 同上註，大中 110，頁 2337-2338。

124 同上註，大中 109，頁 2336。

125 同上註，大中 110，頁 2337-2338。

126 元·單慶修、徐碩纂，《至元嘉禾志》（《宋元方志叢刊》第 5 冊，北京：中華書局，1990），卷 3〈鄉里〉，頁 4431-1。

127 周紹良主編，《唐代墓誌彙編》下，大中 110，頁 2337-2338。

128 同上註，大中 112，頁 2339。

129 同上註，大中 114，頁 2340。

支竦曾任瀘州、光州刺史，可知支詢、支子珪分別卒於瀘州、光州官舍，皆葬於揚州江都。亡於大中七年的支竦之子支叔向，墓誌稱其「一夕暝于江夏之官舍……公以龜筮未從，藁葬於淮濡三載……」，¹³⁰ 可知其卒於鄂州司士參軍任內的江夏官舍，但葬於「淮濡」三年，疑似亦是葬於揚州。

同樣亡於大中七年的，還有支竦之女支子璋，她「歿於東都永泰里……以大中十年五月十八日自揚州啟葬於河南府河南縣平樂鄉北邙山原也」。¹³¹ 也就是說，支子璋卒於洛陽，卻葬於揚州，時間為該家族遷葬邙山的前三年，可知當時支竦尚未有於邙山經營祖塋的想法。

從唐代許多墓誌的記載，我們知道歸葬實為耗費財力、人力之舉，完成歸葬被認為是孝道的表現。¹³² 除了支竦遺願之外，墓誌也從「禮」的角度，解釋大規模遷葬之舉。〈支光墓誌〉曰：

噫！樂立陵遷祖宗非古也，而禮有從權之制焉。¹³³

〈支成墓誌〉曰：

稱家有亡，禮無不備，從宜之權，諒有通制。¹³⁴

墓誌稱遵從父命遷葬洛陽，乃是從權、從宜，並非違禮之舉。但如此大規模的遷葬活動，在當代亦是罕見，墓誌卻刻意說此舉並不違禮，反而顯得極不自然。

支竦過世之際，家族遵從其遺言，進行大規模的遷葬，一方面是該家族以洛陽為家，欲生根洛陽的表現；另一方面，唐代的士族，尤其是山東士族，有不少家族居住洛陽，並且在邙山經營家族墓。¹³⁵ 支竦的神道碑雖未傳世，但〈支謨墓誌〉卻有一段不算短的篇幅描述其父。其中一段如下：

130 周紹良主編，《唐代墓誌彙編》下，大中 111，頁 2338-2339。

131 同上註，大中 113，頁 2339-2340。

132 參見鄭雅如，《親恩難報：唐代士人的孝道實踐及其體制化》（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4），第 3 章〈歸葬先塋〉，頁 99-195。

133 周紹良主編，《唐代墓誌彙編》下，大中 109，頁 2336。

134 同上註，大中 110，頁 2337-2338。

135 參見（日）妹尾達彥，〈隋唐洛陽城の官人居住地〉：67-111。

慕山東之士子，務大門閭，鄙江介之儒生，空勤文藻。由是里為冠蓋，籍甚縉紳，且公且侯，有典有則。¹³⁶

支竦仰慕山東士族「務大門閭」，不屑江南儒生「空勤文藻」。因此遷至「冠蓋」所居之里，¹³⁷讓名聲流傳於「縉紳」之間，¹³⁸為家族奠定發展的基礎。

分司東都是遷居洛陽的契機，但支竦個人對於山東士族的孺慕之心，充分表現出他極欲打入洛陽上層士族圈的願望。該家族與山東士族的通婚，當早於遷居洛陽之前。如第二節所述，支竦續娶清河崔氏，應當在大和年間。其子支叔向娶滎陽鄭氏，可能是在大中五年以前。其他與山東士族的通婚，似乎都在遷居洛陽之後。與支竦父子兩代通婚的清河崔氏，所屬房支不明，居住地亦不明。其他如支叔向妻滎陽鄭氏、支訥妻太原王氏，因墓誌皆未載家世之故，更無法得知其居住地。唯一可知居住過洛陽的姻親，只有支訥妻鄭氏之外祖父李翱，他曾居住洛陽旌善坊。¹³⁹但鄭氏的父親，也無資料可循。如此一來，實無法確定支氏家族的遷葬活動，與山東士族的通婚是否有關連。

支氏家族在唐代士族社會中，是屬於哪一類型的士族？也是一個有趣的問題。張葳以支氏家族遷居、遷葬洛陽為「中央化」、「官僚化」的表現。¹⁴⁰有一點要特別說明的是，最早探討唐代士族中央化的毛漢光，主要是以「著姓」為考察對象，其研究的對象並不包括支姓。¹⁴¹支氏家族的仕宦情況，如第三節所述，其先世本為地方中下層官僚，至支竦一代才得以晉身高官之列。觀其興起的過程，很明顯地發現，支氏家族並非胡族著姓，似乎應以「新興階層」視之，但該家族又與靠科舉起家之「新士族」

136 趙振華，〈唐代支謨及其家族墓誌研究〉，頁 504-516。

137 此句即為成語「冠蓋雲集」之典故。

138 此句即為成語「名聲籍甚」之典故。

139 清·徐松撰，李健超增訂，《增訂唐兩京城坊考》，卷 5〈東京·外郭城〉，頁 271。

140 張葳，〈唐支訥家族遷葬洛陽事考——一個月氏胡人家族的官僚化歷程〉：67-68。

141 毛漢光，〈從士族籍貫遷移看唐代士族之中央化〉，《中國中古社會史論》（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88），頁 235-337。

不同。筆者以為該家族發展的歷程，實有其特殊性。因此，大規模的遷葬，看起來倒像是該家族為了提升家族社會地位所做的努力。

家族遷居、遷葬洛陽，除了支竦個人的考量之外，洛陽作為唐代士族的生活文化圈，這一點也是不能忽視的重要因素。洛陽為唐代官員心目中理想的退休、養老之地，早已為學界所論，此處不多贅述。¹⁴² 居住洛陽城坊，死後葬於邙山，反映了當代官僚所嚮往的生活模式。¹⁴³ 尤其是山東士族之類以文官為職的世家大族，其家族出土墓誌一再地表現出這樣的傾向。而支氏家族的個案則顯示，即使在大唐帝國的餘暉歲月裡，作為政治與文化中心的洛陽，仍然吸引了來自南方的新興家族支氏北遷發展。

此次大規模遷葬之後死亡的支志堅、支君妻崔氏、支訢妻鄭氏、支訥、支謨等五人，墓誌皆載其葬於邙山祖塋周邊。可知該家族自大中十年起至廣明元年為止二十多年間，持續經營邙山的家族墓。在這之後，支詳一家遭受全家遇害之厄運，是否繼續經營家族墓？在無其他出土墓誌的佐證之下，筆者未能有進一步的推論。

五、支氏家族所經歷的地方動亂

從支氏家族墓誌的記載，我們看到家族成員分別歷經數次的地方動亂。

142 關於唐代官僚居住洛陽的風氣，可參考徐蘋芳，〈唐代兩京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生活〉《考古》1982.6(1982.12): 647-656；王吉林，〈晚唐洛陽的分司生涯〉，收入淡江大學中文系主編，《晚唐的社會與文化》（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90），頁 239-249；程存潔，〈唐代東都留守考〉，《魏晉南北朝隋唐史資料》13(1994): 112-123；（日）木田知生，〈北宋時代の洛陽と士人達——開封との対立のなかで〉，《東洋史研究》38.1(1979.6) 51-85；（日）妹尾達彦，〈白居易と長安洛陽〉，收入（日）太田次男等編，《白居易研究講座》，第 1 卷「白居易的文學と人生」（東京：勉誠社，1993），頁 270-296；（日）妹尾達彦，〈隋唐洛陽城の官人居住地〉；甘懷真，〈唐代官人的宦遊生活——以經濟生活為中心〉，收入中國唐代學會主編，《第二屆唐代文化研討會論文集》（臺北：中國唐代學會，1995），頁 39-60 等研究成果。上述諸研究皆述及唐代後期的洛陽，雖然喪失前半期的政治、經濟優勢，相對於長安，生活上反而較為安穩，因此成為退休官員的養老之地，以及失意政客的臨時避難所。

143 參見甘懷真，〈唐代官人的宦遊生活——以經濟生活為中心〉，頁 47-49。

時間最早的，就是建中年間的朱泚之亂，但可惜正史並無記載支成「戡難」之事。該家族所遭遇的其他地方動亂，包括咸通年間南詔入侵邕州與西川、乾符年間河東戰事，以及中和元年支詳全家遇害事件。地方動亂與家族發展的關係如何？以下依序討論。

（一）咸通年間南詔入侵的影響

咸通二年南詔入侵邕州事件，支志堅與崔氏（邕州長史妻）的墓誌皆提及了這場動亂。〈支志堅墓誌〉曰：

今天子之明年，訥兄蒙授藤州牧，傳聞土宜，不異淮浙，嘉蔬鄉稻，粗可充腸，願執卑弟奉養之勤，得申令姊慰心之道，假路東洛，扶持南州。到官逾旬，旋屬蠻擾，方安藤水，忽改富陽，……。¹⁴⁴

墓誌所謂的「今天子之明年」，就是咸通二年。這一年支訥被任命為藤州刺史，因為聽說當地物產豐富，生活條件「不異淮浙」，所以特地繞道洛陽，將誌主接到藤州。由於〈支訥墓誌〉並未記載支訥在藤州刺史之前的經歷，我們無法得知他是從那裡出發至洛陽，再到藤州。至於墓誌說藤州的生活條件「不異淮浙」一點，支氏家族的原居地「淮浙」（揚州、蘇州），為唐代繁榮之地，物產豐富，已於前述。或許因為支氏家族本是南方人，對他們來說，比起洛陽，南方的生活可能更適合他們。但一家人抵達藤州才十多日，就因為「蠻擾」，支訥突然轉任至藤州北邊的富州，生活條件雖然也不錯，但誌主因染「癘氣」（流行傳染病），突然過世於富州官舍。

支訥在短時間內由藤州刺史轉調富州刺史，表面上看起來與南詔入侵無關，但以〈支志堅墓誌〉提及「蠻擾」之故，仍然必須考慮南詔入侵邕州對周邊地區所造成的影響。

另一位直接受到此事件影響的是邕州長史妻崔氏，第二節已經提及她於婚後隨即跟著丈夫赴任邕州，卻遇上「蠻亂」，最終因逃難之旅艱辛，「瘴毒外侵」，¹⁴⁵於咸通二年九月病逝於桂林旅宿，婚姻生活不滿兩年。

144 周紹良主編，《唐代墓誌彙編》下，咸通 020，頁 2393。

145 同上註，咸通 019，頁 2392。

咸通二年的這場動亂，與唐代後期南詔擴張勢力有關。南詔之所以入侵邕州，實與爭奪安南有關。大中十三年南詔攻陷播州（位於黔中道），咸通元年冬安南經略使李鄣復取播州，卻引來南詔乘虛攻入交趾。咸通二年正月，朝廷詔以邕管及鄰道兵解救安南危機，卻反而讓南詔把矛頭轉向邕州。¹⁴⁶

南詔之所以能攻陷邕州，最主要的原因還是在於當地邊防弱化所致。原本有鄰近三道輪流發兵三千人戍守之習慣，邕管經略使段文楚改以召募在地五百多人土軍以取代之。之後的經略使李蒙，更為私利盡罷三道戍卒。南詔攻城之際，正逢李蒙過世，新任經略使李弘源到任才十日，陷入無兵可守之窘境。結果李弘源棄城逃往他地，陷城二十多日後，南詔撤軍，李弘源才回到邕州，但此時當地已飽受劫掠之難。事件過後，李弘源被貶，段文楚回任邕管經略使。¹⁴⁷不過，隔年段文楚即以當初「變更舊制」之罪名，「左遷威衛將軍、分司」。¹⁴⁸

段文楚出自武官家庭，祖父段秀實為建中年間朱泚之亂時殉難之忠臣。乾符年間任大同軍防禦使時為李克用所殺，¹⁴⁹接他位子的就是支謨。他與支氏兄弟雖無共事關係，但在職務異動的時間點上，卻巧妙地與支氏兄弟牽扯上關係。

此外，邕州長史支某到任時間為大中末、咸通初，當時的經略使應該是李蒙。邕州事件發生於七月，支志堅與崔氏兩人於同年九月，分別於鄰近的兩州之地死去，隔年十月八日，家人將她們葬於邕山的家族墓。

邕州事件後八年，咸通十年（869）冬南詔傾全力進攻西川，邊境陷入戰局，朝廷以左神武將軍顏慶復率兵救援。戰況持續至隔年正月，劍南西川節度使盧耽向朝廷告急，並請求遣使談和。支詳遂以朝廷特使的身分，前往前線，此時蠻軍已抵達成都城下。¹⁵⁰

146 參見王吉林，《唐代南詔與李唐關係之研究》（臺北：黎明文化，1976），第 5 章〈和戰無常〉，頁 339-341。

147 宋·司馬光，《資治通鑑》，卷 250「咸通二年七月」條，頁 8095。

148 同上註，卷 250「咸通三年二月」條，頁 8097。

149 宋·歐陽修《新唐書》，卷 150〈段文楚傳〉，頁 4853。

150 參見王吉林，《唐代南詔與李唐關係之研究》，第 5 章〈和戰無常〉，頁 357-360。

如果支詳就是邕州長史支某的話，似乎他與南詔的緣份不淺。朝廷考量到他是「知四方館事」，又曾經歷前一次南詔入侵事件，才派他擔任特使也說不定。這一次的工作，讓支詳得以名留正史，《新唐書》與《通鑑》皆載事件經過。¹⁵¹ 這段史實，已為前輩學者論述之故，此處不多著墨於戰爭過程，而是把重點放在支詳在事件過程中的表現。

進入成都後的支詳，必須馬上面對蠻軍攻城之險境。咸通十一年二月初一南詔攻城未成，初三支詳遣使約和，初五南詔亦請和，初六南詔遣使迎支詳。但以顏慶復援兵將至，又有人言「蠻多詐，毋入死地」，¹⁵² 考慮風險太高，此次支詳並未赴約。至十三日南詔大敗，南詔遣使求和，支詳請對方先退兵，南詔並未退兵。「城中不知援軍之至，但見其數來請和，知援軍必勝矣」。十六日「蠻復請和，使者十返，城中亦依違答之」。可知攻城失敗後，南詔使者頻頻請和，但支詳並未給予對方確切的答覆，應是決意等待援軍到來，所以刻意拖延。兩天後，雙方戰於城下，當晚南詔始退兵。¹⁵³

在這次事件的外交談判過程中，雙方一來一往，並未激發任何衝突場面。支詳顯然相當深思熟慮，做了正確的判斷。幾年後他得以升官，成為節度使，或許與他在此事件中處理得當有關。

（二）乾符年間河東局勢的變化

第三節提到，支謨於乾符五年任河東節度副使，同年轉大同宣諭，之後成為大同軍防禦使，此時的河東局勢，已非其父支竦當年任雲州刺史時的樣貌了。這主要還是與沙陀的崛起有關。支謨赴任之前，就發生了雲中守捉使李克用殺害大同防禦使段文楚的事件。

這個時期記載雲州與沙陀的史料，呈現出紛亂難解之現象。如李克用殺害段文楚的時間點，各史料就有不同的記載。又支謨究竟是段文楚的前任？或是後任？史料之間也有矛盾之處。由於西村陽子已對此進行了詳細的考證，此處主要討論她所提出的兩大問題。

151 參見王吉林，《唐代南詔與李唐關係之研究》，第5章〈和戰無常〉，頁357-360。

152 宋·歐陽修，《新唐書》，卷220〈南蠻中·南詔下〉，頁6287。

153 參見王吉林，《唐代南詔與李唐關係之研究》，第5章〈和戰無常〉，頁361-362。

第一，西村氏採用了與墓誌記載相近之《通鑑》的記載，認為段文楚的遇害時間應該是乾符五年。¹⁵⁴ 如此一來，確認了支謨是在段文楚遇害之後，才被派往雲州的。儘管如此，關於此時期大同軍防禦使人事異動的記載，因為各種史料眾說紛紜，仍然留下難解之題。

例如段文楚遇害後至支謨接任的這段期間，大同軍防禦使的人事異動，該如何理解？《通鑑》「乾符五年四月」條載唐朝廷欲以大同軍防禦使盧簡方與振武軍節度使李國昌兩人交換職務的做法，藉此制衡李克用。可惜策略並未成功，李國昌拒不赴鎮。¹⁵⁵ 但〈支謨墓誌〉載乾符五年「曹翔作伯，移公於大同宣諭」。¹⁵⁶ 案曹翔任職河東節度使是在乾符五年六月至九月的四個月內，¹⁵⁷ 筆者據此推測支謨遷移大同的時間點，應該是在乾符五年的下半年之間。以此觀之，從段文楚遇害至乾符六年夏支謨被任命為防禦使的這段期間，大同軍似乎經歷了一段無主帥的時期。這段期間，有可能一開始支謨是以「宣諭」（或宣慰使）的身分暫代主帥，直到隔年夏天才正式得到防禦使的任命。

第二，乾符五年十二月唐軍與沙陀之間展開激戰，這部分諸史料也出現了記載不一的情形。西村氏指出墓誌與其他史料之間最大的差異，在於墓誌出現了李克用被殺的記載，而其他史料的焦點則放在昭義節度使李鈞戰死之事。¹⁵⁸

〈支謨墓誌〉記載雙方戰鬥過程中，李克用為亂箭射死，之後沙陀又以一年齡、容貌相近者，詐稱李克用生還。誌主屢次上奏李克用已死，但未

154 關於段文楚遇害的時間，目前可見的文獻記載有咸通十三年、乾符三年、乾符五年等三種說法。參見（日）西村陽子，《唐代沙陀突厥史の研究》，第 3 章〈唐末「支謨墓誌」と沙陀の動向——九世紀の代北地域——〉，頁 92-100。

155 宋·司馬光，《資治通鑑》，卷 253，頁 8202。又王壽南，《唐代藩鎮與中央關係之研究》，頁 670-671，「附錄一、唐代藩鎮總表」的「大同」部分，段文楚之後，王氏列了盧簡方（乾符五年二月受鎮）與李國昌（乾符五年四月受鎮）兩人，並且說明盧簡方「未至鎮時李克用據大同，此再任」，李國昌「不願代之」。

156 趙振華，〈唐代支謨及其家族墓誌研究〉，頁 504-507。

157 王壽南，《唐代藩鎮與中央關係之研究》，「附錄一、唐代藩鎮總表」，頁 668。

158 （日）西村陽子，《唐代沙陀突厥史の研究》，第 3 章〈唐末「支謨墓誌」と沙陀の動向——九世紀の代北地域——〉，頁 107-112。

能為朝廷方面所接受。¹⁵⁹對此，西村氏提出（1）死者為李克用的替身；（2）之後出現的是假冒李克用之人；（3）墓誌誇大誌主功績，假造李克用已死之訊息等三種假設。但她又以「沙陀系史料」（《舊唐書》、《舊五代史》之類）皆無載此一事，認為極有可能是沙陀方面消除或竄改不利於自己的記載。¹⁶⁰

墓誌本是私家之物，從誌主角度出發，頌揚誌主事蹟，這點毋庸置疑。但歷史的發展，卻又與墓誌所述不同，該如何解釋？以墓誌詳述事件經過，且其記錄作成於事發後一年，筆者以為仍能反映事實，那就是當時支謨與他的家人堅信李克用已死這件事。結果就讓這段與日後史實不符的記述，就這樣子地流傳下來。

（三）黃巢之亂期間的河南軍情

黃巢之亂開始於乾符二年，中和四年（884）黃巢死去後，仍有餘黨秦宗權的活動，至文德元年（888）秦宗權被捕，亂事始告平定。支氏家族也在這段期間達到鼎盛，卻又迅速覆滅。一方面支謨於乾符五年赴任河東，正值沙陀擴展勢力，河東已非昔日樣貌。另一方面，支詳也在同年成為武寧（感化）軍節度使，此時的徐州亦潛藏著危機。

安史亂後的徐州不但發生了幾次驅逐節帥的事件，甚至如龐勛之亂，也是由派至桂林的徐州戍卒所發起的。軍隊輪番戍邊的沉重負擔，或是節帥賞賜不豐，都有可能成為軍心生變的導火線。¹⁶¹支詳雖然當上了節度使，但是顯然地，這並不是一個好坐的位子。

廣明元年九月為對抗黃巢軍，徐州遣兵三千北上潞水，途中停留許昌，以接待不周之故，軍隊發生鼓譟事件，忠武軍節度使薛能登樓慰勞許久，才平定軍心。已經離城前往潞水的許州大將周岌，聽聞此事，連忙引兵回城，盡殺徐卒，並驅逐薛能。結果薛能於逃亡襄陽途中，全家為亂兵所殺。

159 趙振華，〈唐代支謨及其家族墓誌研究〉，頁 504-507。

160 （日）西村陽子，〈唐代沙陀突厥史の研究〉，第 3 章〈唐末「支謨墓誌」と沙陀の動向——九世紀の代北地域——〉，頁 107-112。

161 關於徐州節帥與軍隊的研究，代表性著作有盧建榮《咆哮彭城：唐代淮上軍民抗爭史》（臺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2008）。盧氏以「敘述史學」的表現手法，描述徐州居民在安史亂後不斷地向唐朝廷抗爭之歷程。

許昌事件發生三個月後的十二月，黃巢入長安稱帝。僖宗已於之前出亡西川，並號召各道兵入關勤王。¹⁶²

隔年的中和元年八月，徐州也爆發逐帥事件。《通鑑》「中和元年八月」條載支詳派遣自己提拔的牙將時溥、陳璠率領五千人，入關討伐黃巢軍，但軍隊不往西行，卻在河陰屠城，又劫掠鄭州，之後才回到彭城。對於時溥等人的行徑，支詳非但不責難，反而慰勞有加，賞賜亦厚。比起他的前任薛能，也就是在許昌事件中被殺的忠武軍節度使，支詳顯然以更有技巧的方式與軍隊互動。但此時時溥已決心逐帥，派人要支詳交出印信。迫於無奈，支詳只好出居大彭館，由時溥接手使府事務。時溥原本安排支詳回朝，但陳璠卻擔心留下後患，率兵埋伏於一行人回朝途中的七里亭，支詳與家屬就在此遇害。事件後時溥為朝廷任命為「武寧留後」，陳璠也得到時溥推薦，成為宿州刺史。¹⁶³

中和元年八月發生於彭城的這個事件，宛如是前一年許昌事件的翻版，節度使為部將所逐，全家慘遭殺害。¹⁶⁴ 彭城事件是支氏家族留在史籍上最後的記錄，自此以後，歷史上再也不見這個家族的身影。以後的幾年之間，關東方鎮發生了一連串的牙將逐帥事件。¹⁶⁵ 這些方鎮皆自據一方，於藩內實行自治，朝廷自顧不暇，只能採取姑息政策。支詳全家遇難事件，只能說是時代風潮下所發生的悲劇。

六、結 論

以瑯琊（琅邪）為郡望，世居江南的月氏人後裔支氏家族，建中年間支成以勤王之功獲得朝廷贈官刺史，日後其子支竦以鴻臚卿致仕。支竦不但帶領家族遷居洛陽，又遺言指示子孫遷葬祖塋於邙山。支竦之子支謨位

162 參見盧建榮，《咆哮彭城：唐代淮上軍民抗爭史》，第 14 章〈最後自治〉，頁 209-211。

此外，關於忠武軍，參見黃清連，〈忠武軍：唐代藩鎮個案研究〉，《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64.1(1993.3): 89-34。

163 宋·司馬光，《資治通鑑》卷 254「中和元年八月」條，頁 8256。

164 參見盧建榮，《咆哮彭城：唐代淮上軍民抗爭史》，第 14 章〈最後自治〉，頁 211。

165 後晉·劉昫，《舊唐書》，卷 150〈王鐸傳〉，頁 4284。

至大同軍防禦使，支詳位至武寧（感化）軍節度使。支謨擁有的財政官經歷，支詳擅長的外交事務，以其所具備的實務能力，得到朝廷的重用。兩人任職方鎮的時間點，正值代北沙陀擴張勢力，華北各地又陷入黃巢之亂的唐末時期。但進入家族發展全盛時期的支氏家族，卻遇上河南逐帥風潮，支詳全家慘遭殺害之禍，可謂是時代潮流下眾多悲劇之一幕。

關於支氏家族墓誌，現今學界已有若干研究成果，筆者重作此課題的目的，一方面試圖整合先行研究的諸多成果，另一方面也透過考證的方式，發掘諸墓誌中更多的細部問題。

首先，在筆者考證支氏家族諸墓誌的過程中，得到幾項重要的進展：

- (1) 長期被誤認是〈邕州長史王君妻崔氏墓誌〉，經筆者考證，將此誌更正為〈邕州長史支君妻崔氏墓誌〉，確認誌主崔氏的丈夫姓「支」。這不僅僅代表支氏家族多了一人而已，更重要的是，誌主崔氏極有可能就是該家族的重要成員——支詳之妻。透過墓誌的記載，不但可以觀察支氏家族的通婚傾向，也可以確認崔氏隨夫赴任邕州時，所經歷的戰爭記憶——「蠻亂」，可以與家族另一位成員——支志堅的墓誌記載內容相互比對。
- (2) 支竦兒子的人數與排行，以墓誌記載前後各異之故，造成學界說法不一的現象。經筆者考證結果顯示，支竦兒子共有十二人，其中有人改名，支誨改名支謨，支讓改名支詳的可能性極高。透過考證的過程，得以確認該家族中的高官人物——支謨與支詳的身分等細部問題。
- (3) 帶領家族進入洛陽的大家長——支竦，以其神道碑未傳世之故，只能依賴其他家族墓誌的記載，獲知其生平事蹟。筆者除了比對家族諸墓誌記載，考證支竦任官的各個時間點之外，還利用杜牧所書之「制」等史料，試圖還原該家族遷居洛陽的確切時間點。
- (4) 筆者嘗試在西村陽子的研究基礎上，進一步地探討支謨的經歷與乾符年間河東局勢的變化，並且建立了家族成員的任官時間表（詳見表二「支竦家族大事紀」）。同時留心支訥、支謨、支詳三兄弟在各個時間點的年齡，以此考察三人的仕途發展。

其次，在整合諸先行研究的過程中，筆者提出了以下的觀點：

- (1) 支氏家族所進行的大規模遷葬活動，是學界關心的重點之一。分司東

都是該家族遷居洛陽的主因，但是因個人對於洛陽的喜愛，加上唐代後期官僚階層的理想生活模式——「住在洛陽，葬在邙山」的風氣影響之下，促使支竦留下遺言，指示後人遷葬祖塋。大規模的遷葬活動，可以視為是一種提升家族社會地位的做法。

- (2) 支氏家族在唐代士族的類型與定位，也是一個引人注目的課題。該家族並非胡族著姓，觀其興起的過程，似乎應以「新興階層」視之，但又非一般靠科舉起家之「新士族」。該家族的發展歷程，實有其特殊性。

本文以支氏家族為研究重點，對於該家族墓誌進行全面性的考察。不同於部分先行研究側重月氏人後裔的漢化問題，唐代後期官僚家族所呈現的樣態，反而是本文觀察的重點。本文所涉及的研究層面，也不只有家族本身，還旁及唐代後期的政治、官制，以及地方動亂。因此，如何正確地理解該家族的仕宦歷程與政治發展的關係？就成為本文的研究重心之一。加上唐代後期地方動亂頻繁，影響的不僅只有官員本身，也及於其他家族成員。陪伴丈夫、兄弟赴任地方的女性，本文透過觀察她們的地方生活經驗，讓後世得以對於唐代後期的士族生活，有了更深一層的認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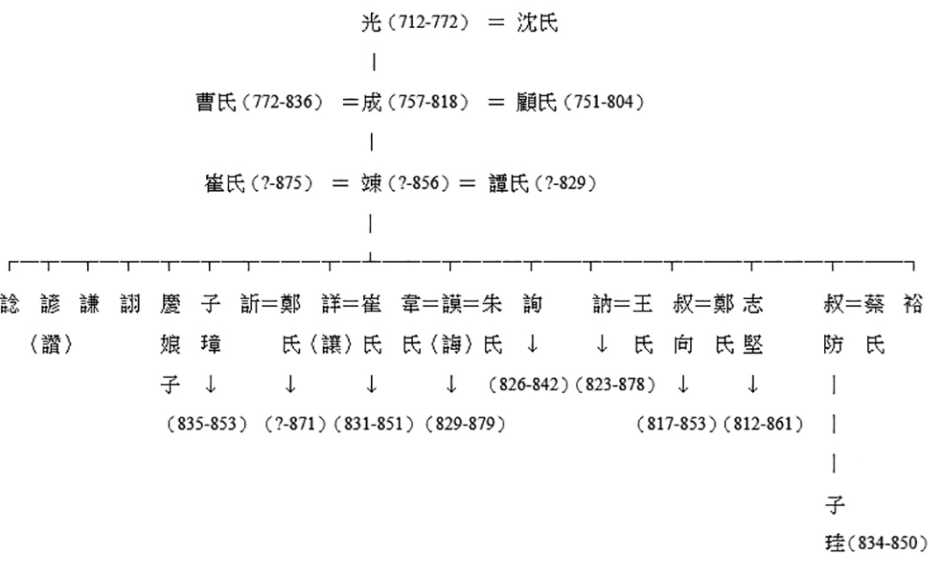
最後，筆者以為支氏家族墓誌所呈現的幾個面向，可以提供未來學界討論相關課題時參考之用：

第一是支氏家族成員的任官傾向。從支竦到其子支訥、支謨、支詳、支訢的仕宦經歷，可以發現從南到北，從中央到地方，分布極廣，顯示這個家族長年「宦遊」的生活。幕職官是中晚唐士人出仕的重要管道，自然也出現在該家族成員的仕宦經歷中。但為朝廷派任使職，尤其是位居高位的方鎮，並非是人人皆可得之機遇。支謨與支詳得以出任方鎮，顯示朝廷看重的是其作為官僚的實務能力。在唐末不安定的局勢下，朝廷的動機與考量，可以提供研究者更進一步地深入探究。

第二是唐末家族的研究取向。支氏家族的興衰，反映了唐末地方社會的變化。該家族載入正史的篇幅雖然不多，但從唐末區域發展的角度而言，探討該家族仍具有意義。尤其如唐末雲州、大同軍記事所呈現的紛亂、矛盾現象，該家族的墓誌亦成為參考史料之一種，發揮了補充的作用。而作為唐代後期的「新興階層」，支氏家族由南往北發展的歷程，呈現出當

代官僚家族的另一種樣貌。這樣的「新興階層」，尚需要尋找同一時期其他家族個案，透過比較與分析，才能突顯其普遍性與特殊性。而這樣的研究議題，正是筆者未來努力的方向。

附錄



圖一 支竦家族系譜

表一 支竦家族墓誌一覽表

編號	墓誌 年代	誌主	撰者	卒年、 卒地	享壽	(原葬地→) 遷葬地	誌石所 藏地
1	大中 10-5-18 (856)	支光 妻沈氏	朱賀	大曆 7-6-12 (772)	61	蘇州嘉興縣學 秀村→ 河南府河南縣 平樂鄉杜翟村	千唐誌齋
2	大中 10-5-18 (856)	支成 妻顧氏 繼室 曹氏	朱賀	元和 13-6-2 (818) 貞元 20-4-16 (804) 舊里進思第 開成 1-4-4 (836) 揚州	62 54 65	蘇州嘉興縣永 樂鄉→ 河南府河南縣 平樂鄉杜翟村 揚州江都縣→ 河南府河南縣 平樂鄉杜翟村	千唐誌齋
3	大中 10-5-18 (856)	支詢	滕綬	會昌 2-8-3 (842) 瀘州	17	揚州江都縣→ 河南府河南縣 平樂鄉杜翟村	
4	大中 10-5-18 (856)	支子珪	豆盧洮	大中 4-11-27 (850) 光州郡齋	17	揚州江都縣→ 河南府河南縣 平樂鄉杜翟村	
5	大中 10-5-18 (856)	支叔向	丁居立	大中 7 (853) 江夏官舍	37	揚州江都縣？ →河南府河南 縣平樂鄉杜翟 村	
6	大中 10-5-18 (856)	支子璋	陳晝	大中 7-9-12 (853) 洛陽永泰里	19	揚州江都縣→ 河南府河南縣 平樂鄉杜翟村	
7	咸通 3-10-8 (862)	支某妻 崔氏	田石	咸通 2-9 (861) 桂林旅次	31	河南府河南縣 平樂鄉杜翟村	千唐誌齋

編號	墓誌年代	誌主	撰者	卒年、 卒地	享壽	(原葬地→) 遷葬地	誌石所 藏地
8	咸通 3-10-8 (862)	支志堅	支謨	咸通 2-9-12 (861) 富州公舍	50	河南府河南縣 平樂鄉杜翟村	千唐誌齋
9	乾符 3-15-14 (876)	支訢妻 鄭氏	支謨	咸通 12-2-6 (871) 洛陽行脩里	?	河南府河南縣 平樂鄉杜翟村	千唐誌齋
10	乾符 6-5-12 (879)	支訥	吳廷隱	乾符 5-7-13 (878) 洛陽行脩里	56	河南府河南縣 平樂鄉杜翟村	洛陽古代 藝術館
11	廣明 1-7-15 (880)	支謨	房凝	乾符 6-12-1 (879) 雲州	51	河南府河南縣 平樂鄉杜翟村	洛陽大學 圖書館

表二 支竦家族大事紀

時間	支竦	支謨	支詳	其他
？	雲州刺史			
會昌二年 (842)	瀘州刺史			八月支詢卒於瀘州。
會昌六年 (846)		舉明經		
大中四年 (850)	光州刺史	應禮部試？		十一月支子珪卒於光州。
大中五年 (851)	秋至大中六(852)年間，由邢州刺史轉任鄆王傅。	內作使判官？		
大中七年 (853)	鴻臚卿(東都分司)			支叔向卒於江夏官舍。 九月支子璋卒於洛陽永泰里。
大中十年 (856)	卒於洛陽？		應書判超絕科？	五月十八日遷葬家族 25 人於河南府河南縣平樂鄉杜翟村(北邙山)。
咸通二年 (861)			邕州長史？	支訥任藤州刺史，同年轉任富州刺史。 九月支志堅卒於富州、崔氏(邕州長史妻)卒於桂林。
咸通三年 (862)		司農寺丞		
？		天德軍副使		

時間	支竦	支謨	支詳	其他
咸通十一年 (870)			元月以太僕卿接受朝廷任命為宣諭通和使（和蠻使）。	
咸通十二年 (871)		太府少卿卸任		二月支訢妻鄭氏卒於洛陽行脩里。 支訢任劍南東川節度副使。
?		濮州刺史		
乾符二年 (875)				支竦繼室崔氏卒。
乾符四年 (877)		右金吾衛大將軍？		
乾符五年 (878)		河東節度副使、指揮制置使，同年轉任大同宣諭（大同軍宣慰使）。	武寧（感化）軍節度使	七月支訢卒於洛陽行脩里。
乾符六年 (879)		夏，任大同軍都防禦、營田、供軍諸使，同年十二月卒。		
中和元年 (881)			八月全家遇害於彭城城外七里亭。	

引用書目

一、傳統文獻

- 唐·杜牧，《樊川文集》，臺北：漢京文化，1983。
- 唐·林寶，岑仲勉校注，《元和姓纂（附四校記）》，北京：中華書局，1994。
- 後晉·劉昫，《舊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76。
- 宋·歐陽修，《新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76。
- 宋·司馬光，《資治通鑑》，北京：中華書局，1956。
- 元·單慶修、徐碩纂，《至元嘉禾志》，《宋元方志叢刊》第 5 冊，北京：中華書局，1990。
- 清·徐松撰，李健超增訂，《增訂唐兩京城坊考》，西安：三秦出版社，1996。
- 清·董誥等編，《全唐文》，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二、近人論著

- 王吉林 1976 《唐代南詔與李唐關係之研究》，臺北：黎明文化。
- 王吉林 1990 〈晚唐洛陽的分司生涯〉，收入淡江大學中文系主編，《晚唐的社會與文化》，臺北：學生書局，頁 239-249。
- 王壽南 1978 《唐代藩鎮與中央關係之研究》，臺北：大化書局。
- （日）木田知生 1979 〈北宋時代の洛陽と士人達——開封との対立のなかで〉，《東洋史研究》38.1(1979.6): 51-85。
- 毛漢光 1988 〈從土族籍貫遷移看唐代土族之中央化〉，《中國中古社會史論》，臺北：聯經出版公司，頁 235-337。
- 毛陽光 2010 〈一支洛陽月氏胡人家族的漢化經歷——以〈支彥墓誌〉與〈支敬倫墓誌〉為中心〉，《華夏考古》2010.4(2010.12): 126-145。
- 支 靜 2010 「小月氏歷史考述」，西安：陝西師範大學民族學碩士學位論文。
- 甘懷真 1995 〈唐代官人的宦遊生活——以經濟生活為中心〉，收入中國唐代學會主編，《第二屆唐代文化研討會論文集》，臺北：中國唐代學會，頁 39-60。
- 全漢昇 1947 〈唐宋時代揚州經濟景況的繁榮與衰落〉，《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11(1947.9): 149-176。
- 全漢昇 1972 《中國經濟史論叢》，香港：新亞研究所。

- (日) 西村陽子 2009 〈唐末「支謨墓誌銘」と沙陀の動向：九世紀の代北地域〉，《史學雜誌》118.4(2009.4): 1-38。
- (日) 西村陽子 2018 《唐代沙陀突厥史の研究》，東京：汲古書院。
- 朱祖德 2009 《唐五代兩浙地區經濟發展之研究》，臺北：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 李貞德 2008 《女人的中國醫療史——漢唐之間的健康照顧與性別》，臺北：三民書局。
- 周紹良主編 1992 《唐代墓誌彙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 吳廷燮 2003 《唐方鎮年表》，北京：中華書局。
- 姚 平 2018 〈會昌滅法時期的女性〉，《唐代的社會與性別文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頁 26-34。
- (日) 妹尾達彥 1993 〈白居易と長安洛陽〉，收入(日) 太田次男等編，《白居易研究講座》，第 1 卷「白居易の文學と人生」，東京：勉誠社，頁 270-296。
- (日) 妹尾達彥 1997 〈隋唐洛陽城の官人居住地〉，《東洋文化研究所紀要》133 (1997.3): 67-111。
- 徐蘋芳 1982 〈唐代兩京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生活〉，《考古》1982.6(1982.12): 647-656。
- 翁育瑄 2000 〈七世紀～十世紀初の中国における上流社会の家族形態——墓誌を中心に〉，《お茶の水史学》44(2000.9): 1-49。
- 翁育瑄 2001 〈唐代における官人階級の婚姻形態——墓誌を中心に〉，《東洋學報》83.2(2001.9): 131-159。
- (日) 氣賀澤保規編 2017 《新編 唐代墓誌所在總合目錄》，東京：明治大學東アジア石刻文物研究所。
- 郭培育、郭培智主編 2005 《洛陽出土石刻時地記》，鄭州：大象出版社。
- 馬小鶴、柏曉斌 1986 〈隋唐時代洛陽華化月支胡初探〉，《中國文化研究集刊》第 3 輯，上海：復旦大學書版社，頁 144-160。
- 馬小鶴 2008 《摩尼教與古代西域史研究》，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 黃清連 1993 〈忠武軍：唐代藩鎮個案研究〉，《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64.1(1993.3): 89-134。
- 張文昌 2008 《唐代禮典的編纂與傳承——以《大唐開元禮》為中心》，臺北：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 張 葳 2012 〈唐支訥家族遷葬洛陽事考——一個小月氏胡人家族的官僚化歷程〉，《民族研究》2012.5(2012.9): 67-73。
- 程存潔 1994 〈唐代東都留守考〉，《魏晉南北朝隋唐史資料》13(1994): 112-123。
- (日) 桑原隲藏 1968 〈隋唐時代に支那に來往した西域人に就いて〉，《桑原隲藏全集》，東京：岩波書店，頁 347。
- 趙振華 2009 《洛陽古代銘刻文獻研究》，西安：三秦出版社。
- 榮新江 1990 〈小月氏考〉，《中亞學刊》第 3 輯，北京：中華書局，頁 47-62。
- 楊樹藩 1988 《唐代政制史》，臺北：正中書局。
- 鄭雅如 2014 《親恩難報：唐代士人的孝道實踐及其體制化》，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 董延壽、趙振華 2006 〈唐代支謨及其家族墓誌研究〉，《洛陽大學學報》21.1(2006.3): 1-10。
- (日) 愛宕元 1997 《唐代地域社會史研究》，京都：同朋舍。
- 賴瑞和 2007 〈論唐代的州縣「攝」官〉，收入杜文玉主編，《唐史論叢》第 9 輯，西安：三秦出版社，頁 66-86。
- 賴瑞和 2008 《唐代中層文官》，臺北：聯經出版公司。
- 賴瑞和 2016 《唐代高層文官》，臺北：聯經出版公司。
- 繆 鉞 2004 〈杜牧年表〉，《繆鉞全集》，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頁 254-258。
- 盧建榮 2008 《咆哮彭城：唐代淮上軍民抗爭史》，臺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
- 魏樂樂 2010 「兩漢迄唐徙居內地月氏人研究」，西安：西北大學歷史學碩士學位論文。

The Zhi Clan as a Microcosm for Gentry Life in the Late Tang Dynasty

Wong Yu-hsuan^{*}

Abstract

The Zhi 支 clan, native of Langye 瑯琊, were descendants of the Yuezhi 月氏 and lived in Jiangnan. During the rebellion of Zhu Ci 朱泚 (742-784) in the Jianzhong era (780-783), Zhi Cheng 支成 (?-?) was awarded the position of provincial governor by the court for his service to the state, and his son Zhi Song 支竦 (?-?) later served as minister of the Court of State Ceremonies, thus situating the Zhi as a high official family. Both Zhi Song's last words that instructed his descendants to relocate and bury their ancestors at Mount Mang in Luoyang as well as the marriage of himself and his son to the old land-owning gentry demonstrate the family's strong motivations to move into the upper class at the capital. In the generation following Zhi Song, the official career paths of the three brothers Zhi Ne 支訥 (823-878), Zhi Mo 支謨 (829-879), and Zhi Xiang 支詳 (?-?) can be described as smooth, as they enjoyed their father's influence and entered officialdom by taking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s and obtaining ranks from second to fourth. Of the three, Zhi Mo and Zhi Xiang in particular progressed up the ladder of bureaucracy, with the two being appointed regional governors of the Datong and Wuning forces, respectively. In the late Tang dynasty at the time when the *fangzhen* 方鎮 governmental system became increasingly important, the Zhi family surfaced at two *fangzhen* (settlement of troops), denoting that the family had occupied a high position within the imperial court—the family's peak in their upward trajectory. Precisely at this peak in the late Tang, however, the Zhi clan ran into a wave of commanders being expelled in Henan and the entire family of Zhi Xiang was brutally killed, thus ending the clan line. The fate of one's clan was thus connected with the history and contexts of the late Tang dynasty, with the Zhi clan's calamitous

* Wong Yu-hsuan,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History, Tung Hai University.

experience being one of the many tragedies of the time.

In addition to the official experiences of male clan members, female members likewise had remarkable life experiences. Zhi Zhijian 支志堅 (812-861), who became a monk at a young age and remained unmarried all her life, converted to Taoism as Buddhism was persecuted in the Huichang era (841-845). Moreover, both she and her brother's wife Cui shi 崔氏 in the second year of the Xiantong era (861) were forced to flee. This demonstrates that family members—especially women—accompanied their husbands, brothers, etc. to the places of their official appointments, but life was not categorically stable as any local unrest would inevitably have a great impact.

Through the epitaphs for men of the Zhi clan, we can understand the processes of how the family gained entry into the upper class of Luoyang as well as the channels that catalyzed their promotion to a high official family. Finally, the local social unrest recorded in the epitaphs for women allow us to peek into the life experiences of the family members of officials, thus providing a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the life of gentry in the late Tang dynasty.

Keywords: late Tang dynasty, the Zhi clan, epitaphs, gentry, *fangzhen* 方鎮